

41  
0  
17

# 理论与实践

LILUN YU SHIJIAN

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月刊  
ZHEXUE SHEHUIKEXUE ZONGHEXING YUEKAN



一九六〇年 一月号

# 目录

学习毛泽东思想，实现理論工作的更大跃进 .....	本刊編輯部 ( 1 )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世界观， 建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	陈越平 ( 5 )
駁“糾左比糾右难”論 .....	东方明 ( 11 )
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 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	齐思成 ( 17 )
“基数决定論”的反科学性 .....	黄佑瑛 ( 29 )
馬寅初哲学思想和經濟理論的实质 .....	康 仁 ( 35 )
关于“老子”若干問題的研究 .....	鍾大史 ( 41 )
关于民間文学的加工創作問題 .....	杜 桐 ( 47 )
——黎族叙事詩“甘工鳥”后記	
紅頌 .....	于向阳 ( 53 )
“紅”“黑”之間 .....	林 遐 ( 54 )
危险的“病患者” .....	黃展鵬 ( 55 )
波波夫画画及其他 .....	岑 桑 ( 56 )
致讀者 .....	本刊編輯部 ( 58 )

## 动 态

广东省掀起学习、研究、宣传毛泽东思想运动的热潮  
暨南大学中文系成立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室  
华南师院举行科学报告討論会  
中山大学历史系完成“林則徐全集”編輯工作  
广州市南区职工开展毛泽东思想学习运动



# 学习毛澤东思想， 实现理論工作的更大跃进！

本刊編輯部

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調动了全国六亿五千万人民的冲天干劲，創造了1958年和1959年大跃进的伟大局面，也推动了理論工作的大跃进。大跃进以来，广东省的理論工作，获得了很大成績：干部和知識分子学习毛泽东著作，学习党的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普遍提高了政治理論水平；工农群众也破除了迷信，掀起了学习理論、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提高了思想觉悟，推动了生产；各級党委大办党校，大搞訓練，提高了党员的思想水平；各地展开了理論研究和学术討論，貫徹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理論工作呈现出一片前所未有的生动活泼的新气象。經過理論工作大跃进，理論工作队伍有了很大的发展，工作上也取得了丰富的經驗，这就为今后理論工作的更大跃进打下了基础。

两年来理論工作能够获得如此巨大的成績，主要是由于党的领导正确，并在理論工作中坚持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方向，貫徹了理論和实践相結合的方針，实行了普及和提高相結合的两条腿走路方針的結果。随着六十年代的来临，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必将有更大的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必将更大的发展，这就要求我們的理論工作也必須有更大的发展，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刘少奇同志說，“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們这样一个拥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东方大国中得到广泛的传播，并且在革命和建設的实践中取得胜利的結果，无论如何，这总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四十年

来，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已經取得伟大的胜利，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还将取得更大的胜利。要在我們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建設社会主义，就必须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有一个伟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运动。这个运动，必将大大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也必将大大地发展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因此，当前理論工作的方向和任务，就是要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方向，进一步貫徹理論和实践相結合的方針、普及与提高相結合的方針，开展一个学习、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創造性地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便貫徹党的总路綫，推进社会主义建設事业。

## (一)

理論工作首先必須以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明确这个方向，对理論工作的发展具有首要的决定意义。

为什么理論工作必須以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呢？馬克思列宁主义是党的一切工作的指南，党在自己的一切活动中都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結合的原则。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的思想和著作，是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結合的杰出典范，因而一貫都代表中国革命和建設的正确方向。毛泽东同志創造性地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設一系列的理論問題和策略問題，形成为一整套以中国革命的实际問題为中心的馬克





思列宁主义理論，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所制訂的民主革命总路綫、社会主义革命总路綫和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是在不断同一切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路綫斗争中形成起来的、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路綫，因而能够动员和指导着全国人民，把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推进到另一个胜利。中国革命和建設的胜利，就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也就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由此可见，毛泽东思想是具体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設問題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是經過斗争实践反复驗證了的唯一正确的理論。无数历史事实証明：当着革命和建設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革命就胜利，建設就順利，而当着革命和建設脱离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时，革命就失敗，建設就受到挫折。我們在具体的工作中也体会到，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工作就会犯錯誤。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方向，是我們革命和建設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証。因此，我們的一切工作，都必須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理論工作也是一样。

經過了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特别是經過了1959年的反右傾斗争，許多人对于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重大意义有了进一步的领会，干部、知識分子和工农群众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热情大大高涨。反对右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一场保卫党的总路綫、保卫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斗争，也就是坚持和贯彻毛泽东思想方向的斗争。要提高保卫总路綫的自觉，彻底粉碎右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世界观，彻底反对资产阶级世界观，就必须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但是，也还有一些人对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重大意义認識不足，对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和建設中的决定作用認識不足。有的人认为毛主席的著作只是方針政策，不是理論，有的人則认为毛主席著作不系統不全面，这些都是錯誤的思想。产生这些錯誤思想，或則是由于对毛泽东思想缺乏認識，

或則是由于孤立静止地对待馬克思主义，把馬克思主义当作是一种僵死的教条。我們知道，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毛泽东思想是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革命和建設的指南。馬克思主义理論来自革命群众的斗争实践，它必然要在斗争实践中不断发展。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它的斗争实践中創造性地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取得胜利的結果，就必然要对馬克思主义的发展做出貢獻。伟大的中国革命，产生了伟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中国革命的导师毛泽东同志，他在中国革命和建設实践中保卫和創造性地运用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取得中国革命和建設的胜利，从而也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貢獻。事实也是如此，毛泽东同志对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經济学和社会主义以及軍事学、文化艺术等方面都已經有了杰出的貢獻。这些都要求我們必須認真地系統地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把学习、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們党的理論工作的中心内容和根本任务。刘少奇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早已說过：“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动员全党来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們的党员和革命的人民，使毛泽东思想变为实际的不可抗御的力量。”刘少奇同志在十几年前所說的这些话，现在看来，仍然有着迫切的现实意义。

## (二)

无论是学习、研究或宣传毛泽东思想，都必须坚持毛泽东同志所教导的理論与实践相結合的方針。毛泽东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結合，因此我們学习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同实践紧密結合。学习理論要同实践相結合，首先要明确学习理論的目的，端正学习态度，必須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問題而去找立场、观点、方法的，也就是說，要使理論为



革命实践服务。因此，学习理論必須同实际斗争結合，为政治思想斗争服务，为贯彻实现党的总路綫服务。当前理論工作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学习和宣传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理論，以便反对右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保卫和贯彻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反对资产階級世界观，树立无产階級世界观。我們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必須圍繞着这个斗争来进行。

坚持理論和实践相結合的方針，必須坚决贯彻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以中国革命的实际問題为中心，以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則为指导的方針，反对孤立地靜止地研究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必須树立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有的放矢”、“学用一致”、“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的科学态度，既反对忽視理論的傾向，也反对脱离实际的傾向。目前理論工作中有两种偏向：一种是学习满足于就事論事，否認或忽視系統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必要性。另一种则是从书本出发，強調所謂系統性，認為学习理論一定要按照书本系統，一章一节学下去，学好才用，否認必須以中国革命实际問題为中心，否認学用一致的原則。显然，这两种偏向都是錯誤的。实际上都是理論和实践脱节，不了解理論和实践的辯証統一的关系。

理論产生自实践，又指导实践。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毛泽东思想都是来自人民群众的斗争实践，但它又是实践經驗的科学概括，正因此它才能揭示事物的本質和规律性，从而指出实践斗争的方向。因此实践必須以理論为指导，理論又必須与实践結合。脱离理論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而脱离实践的理论則是空洞的理論。把实际等同于理論，就会在实际上忽視或否認了理論的作用，忽視或否認学习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样，在实际工作中就会产生盲目性，不会总结經驗，分析問題，抓不住本質和主流，看不到前途和方向，思想落后于形势的

发展，最后免不了要犯錯誤。这是一种經驗主义的傾向。相反，孤立靜止地学习理論，为理論而理論，脱离实际，脱离政治，不以革命的实际問題为中心，理論不解决任何实际問題，則是从根本上背离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实际工作中也免不了要犯“左”的或右的錯誤。这是一种教条主义的傾向。無論是經驗主义或教条主义，都是主观主义即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也是党性不純的表现。我們必須坚持理論与实践相結合，努力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理論工作的党性原則。因此，学习理論必須同实际斗争相結合，同政治思想斗争結合，为贯彻党的总路綫服务。当前在反右傾斗争以后，有必要組織干部和知識分子，以总路綫为中心，圍繞总路綫、人民公社、群众运动、社会主义建設时期的階級斗争、党的領導、无产階級世界观、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等重大的理論問題，学习毛泽东思想。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按不同情况，通过哲学、政治經濟学、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党史等課程来系統学习毛泽东思想。工农学习也必須以总路綫为中心学习毛泽东思想，着重解决总路綫、党的領導和世界观等問題。

### (三)

理論工作要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方向，开展学习、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以此为中心来推动理論工作的更大跃进，就必须进一步贯彻普及与提高相結合的方針，实行两条腿走路。这是理論工作的群众路綫，也是理論工作大跃进的根基本方法。1958年以来理論工作贯彻普及和提高相結合的两条腿走路方針，有了新的发展，必須認真总结經驗，贯彻到今后的理論工作中去。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們，理論掌握了群众，就变成巨大的物質的力量。因此，理論必須与群众相結合，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必須普及到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中去。

普及和提高是辯証的統一，因此应当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两者互相推动，互相促进。当然，在一定的时期內，必須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我們认为：在当前毛泽东思想的学习、研究和宣传运动中，必須普遍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与系統研究毛泽东思想同时并举。在普遍組織学习和宣传的基础上，有计划地組織和推动系統的研究工作，又用系統研究的成果来巩固、提高和充实一般的学习和宣传。

1958年工农学理論运动有重大的意义，是工农群众知識化和直接掌握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第一步，也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大普及的

开始；对提高工农群众的思想觉悟，推动生产和工作，进一步貫徹理論同实践結合、貫徹理論工作的群众路綫都有巨大的作用。因此，除了提高干部和知識分子的学习以外，必須認真总结工农学理論的經驗，繼續有步驟地組織和推动工农群众学习毛泽东思想。

坚持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方向，貫徹理論和实践相結合、普及与提高相結合的两条腿走路方針，掀起一个学习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就能够实现理論工作的更大的跃进。讓我們在学习、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中創造更巨大的成績，来向党誕生四十周年献礼！

## 广东省掀起学习、研究、宣传毛澤东思想运动的热潮

自从中共广东省委作出“关于加强理論工作的决定”后，各地党委立即行动起来，紛紛召开會議，动員和組織干部和群众开展一个全党全民学习毛泽东思想运动。

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于1月13日召开了座談会，动員和布置各单位貫徹执行省委的决定。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越平同志在会上說明了省委的决定，詳細闡明这次学习运动的意义、指导思想、中心內容和学习方法。指出目前理論工作的任务，就是要向广大干部、知識分子和工农群众系統地宣传毛泽东思想，造成一个大规模的、深入的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彻底肃清修正主义和右傾机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宣传无产阶级世界观，反对资产阶级世界观，鼓舞人民坚定地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繼續貫徹总路綫，为爭取社会主义建設的伟大胜利和共产主义的伟大前途而坚决奋斗。并指出目前干部学习毛泽东思想，应当首先着重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論、关于社会主义經濟建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这三方面的学說。学习政治經濟学也要抓住中心，如經濟建設高速度按比例发展問題，农业和工业的关系問題，經濟建設中政治挂帅和大搞群众运动問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問題等。在学习方法上，他強調指出：必須坚持理論联系实际的方法，边学边做、边学边用；并要求必須做到精讀文件、深刻思考，学用結合、写出文章。省委宣传部付部长吳南生在会上作了指示。他十分強調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說，1960年開門第一件大事就是学习毛泽东思想，应当鼓足干劲，以战斗的姿态投入学习运动。

中共广州市委、各地党委也紛紛行动起来，貫徹省委的决定制訂了今年学习毛泽东思想为中心的理論工作规划。确定今年用三、四个月時間，先組織干部圍繞着总路綫、人民公社、阶级斗争、群众运动、党的領導、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以及世界观等七个問題，学习毛泽东思想和著作。为今后进一步系統学习毛泽东思想打下基础。现在，已經在全省范围掀起了学习热潮。

#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世界观， 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世界观

陈 越 平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斗争，归根到底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世界观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这一斗争在我国当前的历史条件下，无论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都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因此，在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彻底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世界观，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

## 一 无产阶级世界观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对立

首先，要弄清什么叫做世界观？世界观就是对客观世界、对社会的总的看法，是有带根本性的、全局性的看法。我们知道，每个阶级对客观世界、对社会都有自己的看法。因此，就有不同的世界观——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无产阶级世界观。一般说来，一个人属于那个社会阶级就具有那个阶级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在通常的情况下，总是通过对客观事物的具体看法表达出来。如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看法，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表达出不同的世界观。虽然他不一定说什么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客观和主观的关系，或者对客观世界对社会的看法如何如何，但归根到底总要接触到这个问题。

我们说，一个人的思想、行动和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以他的世界观为总指导的。如有些个人主义思想严重的人，他们对待一切问题都是从唯我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以此来衡量一切客观事物。把个人主义认为是合情合理、天经地义，别人也都象他一样。大家也许看过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里面有两个典型人物，一个是林道静，一个是林的原来的爱人余永泽。他们两人从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出发，对革命抱着两种不同的态度。余永泽是地主家庭出身，父亲当过县太爷。他的心目中所谓个人的幸福就是把林据为己有，变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把她“留在家里——陪着丈夫，照顾孩子”，给他做饭，弄点吃的喝的，这就是最大的幸福，“大米饭炒鸡蛋，那好极了！”“静，咱们够多么幸福呵！”无怪乎当他看到林道静倾向革命，就要写信警告热情帮助她进步的卢嘉川说什么“幸福家庭，惨遭破坏”，认为卢嘉川对林道静的启蒙教育是“有背人之良知德性”；当他发现林道静参加“三·一八”纪念大会时就倒在床上喃喃自语：“完了，完了，为他人做嫁衣裳”；最后当他发觉林道静坚决走革命的道路时，他才突然明白各人走着不同的道路，而且，“事情已经到了绝望的地步了”。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只有“各奔前程”：他坚持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立场，最后向反动的资产阶级学者胡适找出路；而林道静则坚决走革命的道路。为什么革命对林道静来说是莫大的幸福，而余永泽则认为是最大的“痛苦”呢？归根到底还是一个世界观问题。一个人属于那个社会阶级，就有那个阶级的世界观，并以它为总指导，来衡量、对待和处理

一切。如我們認為人民公社是伟大希望所在，象初升的太阳，共产主义是天堂；但有些象余永泽之类的人則認為“大米飯炒鸡蛋”才是最大的幸福。有些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東西很有感情，留恋得很，而对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对社会主义制度和一切新事物总是指手划脚，拼命指責、攻击，思想感情上总是格格不入。虽然具体的表现各有不同，但归根到底是不同的世界观在那里作怪。

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是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在“自然辯証法”中說：“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了解，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简单地說，辯証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就是对客观事物本来面目的了解。不是用主观来决定客观，而是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来認識問題。馬克思主义世界观最基本的观点就是：承認客观世界是离开人的意識而独立存在的，物質、存在、自然界即客观世界、客观社会、客观事物是第一性的，而一切思想、观念、意識、精神則是第二性的东西。存在决定意識。无产阶级就是用这种观点来認識世界与改造世界。認識是为了改造。这就是无产阶级对客观世界、对社会的总的看法。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則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認為一切客观事物，只不过是人們的观念、意識、精神的反映；沒有我的感觉就沒有客观世界，沒有一切客观事物。是意識决定存在。这是两种世界观的根本分界綫。也是哲学上最根本的問題。一个人的思想和行动，对事物的种种看法，如果追根求源，就必然要接触到这个哲学上的根本問題。如对总路綫、人民公社、大跃进、革命的群众运动等，我們說好得很！但也有人說糟得很！說好得很，这是离开人們的意識而独立存在的客观事实，不是个人主观愿望。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正确和伟大成就，从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的客观事实已經得到充分的証明，它加速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改变着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提高了生产，改善了生活，給广大劳动人民带来了建成社会主义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伟大的幸福前途。这些都是不容抹煞的客观存在。当然，在运动中也出现一些缺点，那也是客观存在。我們对运动中出现的一些缺点进行分析，說明这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是暂时性的、局部性的缺点，是不可避免的缺点。这正是辯証唯物主义的看法，也就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的了解而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我們說好得很，就是这样来的。只有对事物有正确的認識才能得出正确的結論。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对上述問題的看法恰恰相反，他們对客观事物总是加以歪曲、甚至捏造，閉着眼睛不看事实，硬說“大跃进是假的”，大跃进是“大跃退”，說“公社不如高級社，高級社不如初級社，初級社不如互助組，互助組不如单干”，說总路綫是“苦路綫”，甚至恶毒地攻击說是“死路”、“絕路”。难道这是事实嗎？完全不是。他們是从主观唯心主义，从一部分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富裕中农的阶级利益出发，来歪曲、污蔑、捏造、夸大，不承認客观事物，把极少数人的主观愿望作为客观事实。他們希望人民公社垮台，希望社会主义搞得不好，起碼不要搞得那么快，想把历史拉向后退。这些人的眼睛被资产阶级思想蒙蔽着，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看不见。前者是承認存在决定意識，因此如实地得出好得很的判断；后者是拿主观歪曲客观，因此主观地得出糟得很的結論。由此可见，人們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这些带根本性的問題，有两种不同看法，好与糟只是一字之差，两种世界观就馬上反映出来。

有人說：“我只要把工作做好就算了，別管什么世界观不世界观”。这种看法对嗎？不对。他們把世界观看成是私人的事情。我們認為，世界观的問題从来就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个人的“私事”。如果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沒有确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肯定說他的工



作是做不好的，而且肯定要犯錯誤，今天不犯，明天要犯。既然世界觀是對社會和世界總的看法，是總的思想指導，並以此來對待和衡量一切事物，這能不在工作中反映出來嗎？怎么能說是“私事”。當然，以什麼樣的世界觀來對待一切事物，是有時暴露出來，有時隱蔽起來的。就是說，當有一定的條件、氣候就暴露出來。所以說，世界觀對工作有很大關係，絕不是個人的“私事”。有些人組織上入了黨，但思想上沒有入黨或沒有完全入黨。這樣的人，要他堅決完成黨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和黨一條心，是不可能的，我們說他是半條心或者是黨的同路人。

為什麼現在特別強調要解決世界觀的問題？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從整個階級鬥爭的形勢來考察。“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一書指出：“當前的時代，是革命的無產階級世界觀與資產階級世界觀鬥爭最激烈的時代”。全世界是這樣，在中國目前階段階級鬥爭的情況更是這樣。這正如毛主席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個著名的講話中所指出的：“在我國，雖然社會主義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說來，已經基本完成，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余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這段話是在一九五七年說的，現在看來非常重要，非常適合當前的階級鬥爭情況。這段話告訴我們，只要資本主義制度在世界上還沒有完全消滅，只要資產階級的思想影響還存在，那麼，就還會有階級鬥爭。這種鬥爭必然反映到黨內，影響到黨內一些不堅定分子，他們在階級鬥爭的緊要關頭，就往往從黨的內部發動向黨進攻，指手劃腳，諸多非難、不滿，甚至肆意攻擊，進行分裂黨的活動。事實正是這樣：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鬥爭就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政治戰綫和思想戰綫上的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一九五九年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同樣是這種階級鬥爭形勢最突出的反映，是政治戰綫和思想戰綫上階級鬥爭的繼續和深入發展。特別是一九五八年以來，黨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綫，取得了全面大躍進，實現了人民公社化。這些事情說明，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已經推進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最後消滅資本主義經濟和個體經濟的階段。這就是說，資本主義和個體經濟制度，在我們國內到了最後滅亡的時候了。這是兩條道路鬥爭到了決定誰勝誰負的緊要關頭。在這一鬥爭中，可以從兩方面來看，一方面，我們不僅要徹底消滅資本主義經濟和小生產者的個體經濟，而且對一切由剝削制度所產生的私有觀念、傳統習慣、極端個人主義、唯我主義的世界觀等等，也要毫不留情地加以摧毀，給予殲滅性的打擊。很明顯，這是一場政治思想領域中的解放戰爭，象淮海戰役一樣，要對資本主義的上層建築進行一次殲滅戰。但在另一方面，那些堅持資產階級思想的人，堅持資產階級世界觀的人，幻想資本主義復辟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農村中代表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一部分富裕中農，以及它們在黨內的代理人——右傾機會主義者，則妄圖作垂死的掙扎、反抗，甚至進行猖狂的進攻。右傾機會主義者為什麼要進攻總路綫、大躍進、人民公社呢？就是因為總路綫、大躍進、人民公社要最後徹底消滅資本主義經濟和小生產者的個體經濟，他們要維護這個東西，於是起來反抗，甚至找到機會發動猖狂進攻。這就充分說明，為什麼右傾機會主義者選擇這個時機集中反對總路綫、大躍進、人民公社。從我國當前整個階級鬥爭形勢看來，

这场斗争絕不是偶然的。一方面要彻底的摧毁资产阶级的这一切障地；另一方面要挣扎、反抗、发起絕望的进攻。当前形势的特点就是这样。

为什么这场阶级斗争的特点突出地表现为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因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资产阶级已经失去了他的经济力量，剩下来能够向无产阶级进攻的主要武器就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问题很清楚，现在不是武装斗争，主要是政治思想、意识形态、世界观方面的斗争。资产阶级靠他们的政治影响，靠他们的世界观来侵蚀党内一部分意志不坚定的分子或原来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没有什么改造的人，利用他们在我们党内发起进攻。而党内有很多同志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参加党的，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思想准备，因而当社会主义革命进一步深入发展的时候，社会上的各种世界观的斗争也就反映到我们党内来。党内一小部分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和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他们有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为党、为人民也做过一些工作，当革命的列车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特别是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更深入即要最后消灭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所有制的时候，就认为革命革到自己的头上来了。是的，这话说得对，就是要革到自己头上来了，就是要革掉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世界观。就在这时，他们便挺身而出，发动了向党进攻，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党领导下的革命的群众运动，而这在实质上正是反对社会主义，最后企图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我们现在突出的强调世界观的斗争，就是根据这个阶级斗争的形势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一切历史转折时期，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不仅表现在经济、政治领域上，而且还表现在思想领域方面。在这次两条道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中，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世界观，这对于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将具有极其重要极其深远的意义。

从这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世界观的斗争不是枝节问题，而是一个根本问题。现在我们所进行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斗争，在思想意识上就是无产阶级世界观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为什么？因为右倾机会主义者犯错误的原因虽然是各式各样的，但根本的、具有决定性的思想根源是世界观问题。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在政治上、思想上必然是右倾的。因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不相容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越深入发展，越要消灭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及其一切上层建筑的残余影响，越要彻底反对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这时候，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越容易反映出他们的严重右倾。他们妄图阻止历史车轮的飞跃前进，至少也想拉后腿，迫使我们放慢建设的速度，借以苟延残喘。从这次反右倾斗争当中看出，很多人挖根时，最后都挖到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问题上。因为他们有这种思想，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就不会积极，严重的就会反对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反对党的领导。有些人和右倾机会主义者共鸣，正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因此，目前我们全党进行的反右倾斗争，在思想意识上就是无产阶级世界观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只有把产生右倾机会主义的这个思想根子挖掉，才能确保反右倾斗争的彻底胜利，确保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才能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 二、对资产阶级世界观一些突出观点的批判

在我们党内和革命队伍的一部分干部中，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和侵蚀是十分严重的。有些同志开始时对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思想上不重视，马马虎虎，就是没有看到这个问题



的严重性，沒有看到右傾是当前工作的主要危險。許多同志，甚至是一些老同志、老黨員，在自我批判中挖到灵魂深处，还发觉有一个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小天地、小王国。在他們脑子里，有不少无產階級思想，但也有不少資產階級思想，象封建割据一样，坚持斗争十多年、二十多年，还是在他們脑子里建立根据地，长期負隅頑抗，这次暴露出来了。許多人也检查了組織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没有入党。有些人检查出，他們的思想 and 行动，对党的領導，对群众运动的态度，对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一系列錯誤的看法，挖到根源时发现原来是自己的資產階級立场、資產階級世界現象一条白綫一样貫串起来的。很明显，在政治思想上，无產階級世界观不去占領这个陣地，資產階級世界观就来占領。而資產階級世界观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各种各样的道路来向人們进行侵袭的。

資產階級的世界观，簡直象一个能迷人心窍的“鬼魂”一样，只要人們的脑子里还有这个“鬼魂”，无论是新干部还是老干部，无论是知識分子，还是工农干部，如果他們不坚持用无產階級世界观不断地改造自己，做一个坚定的无產階級革命家，那么，他們就有可能变为資產階級的俘虏。在反右傾斗争中暴露出来，資產階級世界观反映在各个方面：有的是唯我主义，有的是革命成功思想，有的是“入股”思想，有的是个人英雄主义、名位思想，有的是反映富裕中农思想，也有的是享乐主义思想。形形色式，但归根到底都是資產階級世界观。因此，无论什么干部，什么階級出身，也不管你搞什么工作，都有一个思想改造、思想革命的严重任务：改造自己的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特别是非无產階級出身、思想未經彻底改造的同志更加要自觉地进行思想改造。这个改造实质上就是两条道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

从这次反对右傾机会主义、反对資產階級个人主义斗争中，我們看到資產階級世界观中最突出的、也是最普遍的論理武器，主要有所謂“自由”、“民主”問題；有所謂“人性”、“人道主义”問題；有所謂“正义”、“良心”問題；有所謂社会主义“物質文明不如資本主义”問題，等等。因此，必須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以階級分析的方法来批判在这些問題上所表现出来的資產階級观点。

首先談談什么叫自由？什么叫民主？我們說，自由和民主是有階級性的。有无產階級的自由，就沒有資產階級的自由。資產階級的所謂自由，实质上就是要求有剝削雇佣劳动的自由，有做买卖的自由，有掠奪殖民地的自由；另一方面对劳动人民來說，就是只有被剝削、被掠奪的自由。毛主席在“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說得很清楚，他說：“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沒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階級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剝削階級剝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沒有劳动人民不受剝削的自由；有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就沒有无產階級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我們对人民是实行民主的，但对地主、官僚資產階級、反革命分子就要实行专政，两者是对立統一的。毛主席說：民主自由，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它是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我們实行民主，把民主自由給予劳动人民，作为鼓舞人民积极性的一种手段；作为鼓舞人民起来斗争的有力武器。在过去是鼓舞人民起来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資本主义作斗争，而现在是鼓舞人民起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动员千百万人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这样的民主自由，在我們中国有沒有呢？充分不充分呢？事实証明：在我們的国家，自由和民主是最彻底的、最充分的。在建設社会主义中，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万众一心，为了迅速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發揮了伟大的集体力量，这种集体行动完全是建筑在自觉的基础



上的。右傾机会主义者污蔑我們是强迫劳动、不自由。他們企图用这种笨拙的“神話”来欺騙人民，好象共产党是用什么“强迫命令”的办法，使六亿多人民一致行动起来。他們沒有看到：群众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自己解放自己，当家作主，永远摆脱被奴役与被剝削的生活，这不是最大的民主？最大的自由？难道說把他們束縛起来，用繩子捆起来，替地主当牛馬，給資本家做工，才是最大的自由？最大的民主？我們說，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在劳动生产、集体生活中，在政治、經濟上享有充分的社会主义的民主权利。当然，我們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象我們目前工厂、企业、机关、团体以及人民公社所过的集体生活，是有领导的民主生活，这是完全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的，而且也是为他們所乐意接受的。至于有些人要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民主自由，或者是損害集体利益的民主自由，我們說，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是沒有的，永远也不会有的。給这些人以反社会主义的所謂民主自由，广大劳动人民是絕不答应的。

第二、所謂人性、人道主义問題。我們說，人性、人道主义也是有階級性的。我們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階級斗争中，得出这么一条宝贵的經驗：“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酷”，“寬纵了敌人，就是对自己犯罪”。人道主义这个概念是階級社会的产物。具有資產階級世界观的人，或者是別有用心的人，硬說共产党人喜欢斗争，說我們“沒有人性”，难道他們不正是拿这些观点做武器来向我們进攻嗎？剝开皮来看，这些滿口“慈悲”、“人性”的人，其目的就是反对我們土改中镇压地主階級，反对我們肃反中镇压反革命分子，反对我們在三反、五反中打退資產階級的猖狂进攻，反对我們在整风反右斗争中粉碎右派分子的复辟阴谋。就是要我們不搞土改，不搞鎮反，不搞三反、五反，不搞反右派，要我們放下武器，思想上解除武装。一句話，就是取消階級斗争。这是什么人道主义？其实，这正好說明过去我們坚持階級斗争，坚决进行镇压反革命、土改和反右派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不这样，就不得了，广大劳动人民就永远不能翻身。如果我們不斗争，对階級敌人講人道主义，讓他們的反动复辟阴谋得逞，我們連脑袋都沒有，那里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离开階級关系来談什么“人性”、“人道主义”，这是非常危险的。

第三、正义和良心也是有階級性的。有人認为对党、对社会主义不应该“歌功頌德”、不能违背“良心”說話，不应该“盲从”。甚至把反党、反社会主义說成是“正义感”、“硬骨头”。这种人站在什么立场說話，用心何在，是不难看出来的。正义和非正义的分界綫在那里？主要是看你站在什么立场，替什么階級說話。究竟地主剝削压迫农民是正义呢，还是农民起来反抗地主剝削压迫是正义呢？究竟是在国民党反动統治下，人民过着奴隶牛馬一样的生活是正义呢，还是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彻底翻身解放、建設幸福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是正义的呢？要回答这个問題，道理也很简单，就看你站在什么立场、替什么階級說話。良心也是这样。如果要講良心，首先应该关怀的是六亿多人民的命运，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而不是心目中只想到那一小撮沒落階級的残余分子。我們說，站在六亿多人民的立场，替六亿多人說話，合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才是真正的良心。否則，你說的是对不起六亿多人民的話，做的是对不起六亿多人民的事，那叫做沒有良心。有些人缺乏階級分析的观点，把党性和良心对立起来看，認为党性是党强加在他們身上的，而良心則是他自己的。这种論調是极端錯誤的。这就充分証明，他名义上是个共产党员，但脑子里却充滿着所謂超階級的反动思想，实质上是在所謂超階級的“良心”掩盖下，販运其資產階級的反党、反馬列主义的貨色。有这种錯誤思想的人，肯定說，他对党是不一条心的。事实很明显，离

开階級斗争談正义、良心，其結果最容易陷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泥坑里去。

第四、所謂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不如資本主义的問題。本来这是个老問題，也是馬克思主义政治經濟学已經解决了的一个根本問題。馬克思的資本論就是分析資本主义社会的，它把資本主义腐敗透頂的本質充分揭露出来；列宁的帝国主义論就是分析資本主义制度发展到了腐朽、沒落、垂死的阶段；毛主席說“帝国主义一天天烂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来”，“社会主义制度終究要代替資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們自己的意志为轉移的客观规律。”这是完全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现在有人硬要把这个腐朽的、沒落的、垂死的制度認為是非常好，不管你怎样說，他还是說資本主义好。根本問題就是世界观不同。这些人的資產階級世界观未有很好改造，有的还是原封不动。有些人确实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也有的是“好了疮疤忘了痛”，当他們遇到一点点困难的时候，倒羡慕起香港那种腐朽的生活来了，好象香港的殖民地生活，失业、貧困、人吃人的社会，比我們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突飞猛进、沒有剝削、沒有失业、沒有要飯、沒有娼妓等等这样的制度还要好一些似的。有些人以香港、美国的人剝削人制度以及腐朽、墮落的生活方式为“文明”，但是这种“文明”，对于广大劳动人民來說是完全不需要的。我們以沒有人吃人的现象为光荣，以消灭失业、貧困、妓女等为文明。这正表明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具有資產階級世界观的人，甚至認為美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圓，这是一种奴才思想。恰好証明：不是我們制度不好，而是他們的思想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造，不然的話，是很危險的。

### 三 建立和巩固无产階級的世界观

一切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都應該在反对右傾机会主义这一斗争中，坚决树立起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建立和巩固无产階級的世界观。也就是說，要彻底的改造資產階級思想、資產階級世界观，逐步树立起无产階級的世界观，做坚定的无产階級革命派。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中，談到知識分子必須繼續改造自己時說：“世界观的轉變是一个根本的轉變”。这就是說，逐步地抛弃資產階級的世界观，树立无产階級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是人們思想改造的根本問題。我們现在要过好社会主义关，过的好不好，最根本的問題是看我們的世界观解决到什么程度。經過这次反右傾机会主义斗争，要求我們逐步确立无产階級的世界观，确立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怎样才能确立无产階級世界观呢？这就是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条件下，对待任何事情，都能毫不动摇地坚持无产階級的观点，坚持革命的坚定性，特別在历史轉折的紧要关头，当革命的列車飞快前进的时候，或者当遇到什么风吹草动的时候，或者当遇到某些困难的时候，这都是考驗每个党员、每个干部的革命坚定性的时候，看你是站在无产階級立场，坚持无产階級的世界观，向一切錯誤的思想行为作坚决的斗争呢，还是动摇害怕，丧魂落魄，站在旁边指手划脚，或者是站在反方面，趁机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呢？这里鮮明地反映出两种立场、两种世界观的問題。我們要确立无产階級世界观，就要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对待任何事情都抱有一种坚定不移的态度；特別是在对待党的领导和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上，坚定地做党的驯服工具，坚定地站到群众运动之中满腔热情地和群众一道前进。如果能做到这样，我們的无产階級世界观才算树立起来。当然，这不是一下子可以做到的，但必須严格地要求自己，要逐步树立起无产階級的革命的坚定性，象岩石一般坚定。



要过好社会主义关，就要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要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就要进行世界观的革命，要进行世界观的革命，首先要转变阶级立场。许多事实充分说明，人的阶级立场是决定人的世界观的，而人的世界观又反过来反映或表现人的阶级立场。因此，我们必须特别着重解决世界观的问题、阶级立场的问题。如果你对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能坚持无产阶级立场，特别在紧要关头，都能坚持无产阶级的世界观，那么可以说这个关基本上是过得好的。反之，如果你看问题，总是离开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离开无产阶级立场，那就是说过得不好或不大好。实际上，世界观和立场是密切相互联系的，立场决定世界观，世界观反映立场。

既然人的阶级立场决定人的世界观，那么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是否可以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当然可以。人的立场、观点是可以改造的，问题是看你是否能下决心改造自己。一方面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提高觉悟；另一方面在实际斗争中坚持锻炼，经过一个改造的过程，逐步进行世界观的革命，把阶级立场逐渐转变过来。当然，转变不是容易的，这是一个痛苦的思想斗争过程。自我改造的觉悟越高，改造越彻底，斗争过程就可以缩短。如果自我改造的觉悟不高，痛苦的斗争过程就会越长。我们党内有些老同志，虽然出身于非无产阶级，但经过不断改造，表现出高度的革命坚定性，坚持无产阶级立场，这是我们很好的榜样。这些事实说明，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同志，只要认识清楚，下定决心，是可以锻炼改造过来的。

有些人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没有很好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在他们身上仍然保持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唯我主义、享乐主义、名位思想等许多肮脏的东西。为此，每个非无产阶级出身的、未经彻底改造的同志必须深刻认识改造自己世界观的严重意义。要下定决心，过好社会主义关，彻底的进行自我思想改造。

怎样才算比较彻底的改造？要改造彻底那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只能说是改造的比较好，比较彻底。象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示的：“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要真正做到使自己的阶级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阶级感情发生变化不是简单的事情。毛主席拿亲身的经验来教育我们，他说，原来阶级感情没有变化的时候，看到工人、农民脏得很，不愿接近他们。但当世界观、阶级感情发生变化以后，就感到工人、农民是最干净的，尽管他们的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但还是比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干净得多。我们要从这里领会毛主席教导我们进行自我革命、自我改造的精神，从一个阶级转变到另一个阶级。什么时候，我们对待革命的一切事物，产生一种象毛主席所说的那样的阶级感情，那么，尽管我们看到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前进步伐中，脚上沾有一些灰尘、有一些牛屎，但我们仍然会感到我们的整个事业是伟大的，是好得很的。我们要做到使自己的感情和革命的事业完全分不开，要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如果感情变化达到这个程度，那就算改造得差不多了。当然，所谓改造得差不多，也不是绝对的。对我们每个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同志来说，改造与提高是无止境的。我们要下决心，遵循毛主席的指示，努力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造。改造不够彻底的要进一步彻底改造，好的要做到更好。

每一个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他必然是思想解放的，必然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必然是对贯彻总路线充满信心的。也就是说，世界观的改造越彻底，我们就越能正确的认识世界，从而也就更能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积极地改造世界，对党对社会主义革命



事业也就会做得更好。

当然，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不要以为经过一次运动就可以彻底解决问题，要认识这是一个过程，对有些人来说还只能说是一个开始。但是也不要以为既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就放松了抓紧自我改造的机会，要看到目前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发展到两条道路斗争决胜负的关头，斗争越深入，世界观问题不很好解决，保留任何肮脏的东西，对革命、对个人都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改造思想，改变立场，逐步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世界观，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急不容缓的根本任务。那种认为既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就可以慢慢来的想法是极端错误的。因此，虽然在这次斗争中不可能一下子完全解决问题，但要有一个决定性的转变，取得一个决定性的胜利。

### 暨南大学中文系成立“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室”

暨南大学中文系在党的领导下，坚决贯彻劳动与教学相结合的方针，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指导，进行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强调理论结合实际，为党培养新的文艺工作干部。

为了在已有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加深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研究，以便迅速提高科学研究水平，提高教学质量，配合着当前开展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运动，中文系已于我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诞生六十六周年的那一天（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成立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室。这个研究室在校党委领导下，今后将积极开展研究工作。以研究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为主，并结合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关于文化艺术的著作，力求结合文艺思想斗争和文艺创作实践，通过具体分析，比较系统地阐述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并通过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学习、研究，提高中文系教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水平及阅读、分析艺术作品的的能力，以提高教学质量。

现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室的成员已分成若干研究小组，订出集体研究计划，以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纲，分别开展文学理论问题的研究工作。（暨大中文系）

# 駁“糾左比糾右難”論

— 东方明 —

我們黨進行的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這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两條道路鬥爭的繼續。

為了反對黨的領導，反對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綫，右傾機會主義者製造了一種極端虛偽的所謂“糾左比糾右難”的謬論。這種思想在一部分幹部中間有它的一定市場。因此，有必要來揭穿這個謬論的實質，以便徹底清除右傾機會主義的毒素。

右傾機會主義者總是把“左”傾看作我們工作中經常的主要的危險。而我們卻認為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整個歷史時期，右傾是主要的危險。

我們知道，過渡時期並不是階級鬥爭的終結，而是階級鬥爭在另一種形式下的繼續。只要階級還沒有最後消滅，只要資產階級思想影響還存在，並且只要資本主義制度在世界上還沒有滅亡，那末就還會有階級鬥爭。這個鬥爭不但要在經濟戰綫上進行，同時還要在政治戰綫上和思想戰綫上進行。資產階級總是本能地要採取各種辦法反對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成為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階級鬥爭的主要內容。這個鬥爭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由於社會上階級鬥爭的客觀存在，它也就必然會反映到黨和革命隊伍內部來。在我們黨和革命隊伍內部，一些立場不堅定的、仍然保持着資

階級思想意識的人，他們對社會主義的種種懷疑、動搖和不滿，也就是他們的右傾思想和右傾活動，正是資產階級的反社會主義思想、活動的一種反映。特別是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緊要關頭，他們就會從內部起來反對黨的領導，反對黨的總路綫，反對黨的重大革命措施。因此，黨內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是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整個鬥爭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徹底克服右傾機會主義，肅清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堅決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這是黨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經常的、重要的任務。

如上所述，右傾所以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主要危險，首先是由於階級鬥爭的存在，由於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的存在，由於資產階級反對社會主義的政治活動、思想活動的存在；同時，也還由於大量的中小資產階級的存在，這些處於“中間狀態”的人的大量存在，使資產階級政治思想影響獲得廣闊的市場。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私有觀念、自由觀念、守舊心理、享樂思想等等，使他們嚮往和習慣於資本主義，而對於社會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生活則格格不入。因此，凡是有這種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的人，往往對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懷有抵觸情緒，反映出不同程度的右傾思想，並且很容易接受右傾機會主義的影響。

在高速度建設社會主義和改造自然的鬥爭中，人們的主觀認識往往落後於客觀形勢的發展，有些人對於群眾的革命積極性和人

的主观能动性估計不足，安于现状，用资产阶級革命家的思想观点来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对待社会主义建設事业，因而也容易产生各种右傾保守思想，以致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成为右傾机会主义的俘虏。

几年来的事实，也完全証明右傾是我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事业的主要危險。因此，很明显，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左”的傾向固然也要注意防止，但是，右傾却是我們必須經常警惕和着重克服的主要危險。

右傾机会主义者集中反对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說來說去，无非是这个“搞快了”，那个“搞糟了”，实质上就是反对我們坚决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我們高速度地建設社会主义，反对我們采取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搞社会主义。而沒有革命到底的决心，沒有高速度，沒有群众运动，当然也就沒有什么社会主义。所以，右傾机会主义同我們的分歧，絕不仅仅是方法問題上的分歧，而是要不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根本分歧，是要资本主义还是要社会主义的問題。坚决貫徹执行党的总路綫，就能最快地建成社会主义，而按照右傾机会主义的路綫走下去，就只能导致资本主义在我国的复辟。这就是爭論的实质所在。

“借口在实行党的正确路綫中有过火行为，就来取消这条路綫，用机会主义的路綫来代替它。”（“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82頁）这就是右傾机会主义者慣用的手法。他們污蔑大跃进、人民公社“搞左了”，“搞乱了”。毫無疑問，“左”的傾向也是我們需要糾正的，因为它对革命事业也会造成損害。但是，右傾机会主义把执行总路綫过程中产生的一些缺点，即使是局部的、暫时的和难以避免的缺点，都一律不分青紅皂白地加上“搞左了”的罪名，这显然是完全錯誤的。他們从右的立場看問題，因此一切都变成了“左”。实际

上，他們攻击的所謂“左”，恰恰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中的最根本的、最革命的东西。他們攻击总路綫，攻击大跃进，攻击人民公社，实质上是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

在执行党的总路綫过程中，絕大多数同志都是正确地貫徹了党的总路綫的，因而成績很大，事情办得好得很。虽然有的同志由于缺乏經驗，在工作中产生了一些缺点，这完全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而且一般地說，由于他們的主观愿望原是想把事情办得更多、更快、更好，所以这些缺点一經党的領導指出，他們就很快改正了。相反，右傾机会主义的錯誤就不是这样，它是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錯誤，往往不經過严重的批評或斗争，就不容易彻底抛弃他們的錯誤立場，真正站到党和人民方面来。对于有些人，右傾是他們难以克服的“頑症”。如果不經過脫胎換骨的改造，他們不但不能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到底，而且会成为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絆脚石。

“左”傾或右傾錯誤，对党的事业都有很大的危害。但是两种錯誤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政治性質是不相同的，在一般情況下，“左”傾通常是小资产阶級思想影响或者是看問題有“左”的片面性的錯誤；而右傾往往表现为根本立場問題上的錯誤，它是资产阶級思想和政治影响在党內的反映。因此，右傾比“左”傾具有更大的危害性，特别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更是如此。

毛主席曾經指出：“修正主义，或者右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級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險性。修正主义者，右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馬克思主义，他們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們所攻击的正是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們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論和辯証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領導，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



設。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基本勝利以後，社會上還有一部分人夢想恢復資本主義制度，他們要從各個方面向工人階級進行鬥爭，包括思想方面的鬥爭。而在這個鬥爭中，修正主義者就是他們最好的助手。”毛主席這段話極深刻地揭穿了右傾機會主義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本質，說明了為什麼右傾

機會主義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主要危險。所以，我們每個黨員和革命幹部都應當提高政治嗅覺，認真思索問題，學會鑒別事物的本質。我們應當加強黨的總路綫的學習，加強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學習，不調和地和右傾機會主義作鬥爭，用實際行動來保衛黨，保衛黨的社會主義事業。

## 華南師院舉行科學報告討論會

1月9日至23日，華南師範學院舉行科學報告討論會，總結成績和經驗，開展學術爭鳴，並動員全體師生在1960年繼續向科學大進軍。

一年來，華南師院在科學研究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績。1959年共完成哲學、社會科學方面的研究項目239個。在這次科學報告討論會上提出報告討論的哲學、社會科學論文共54篇，其中有4篇在全校大會報告討論，其餘在系的分會報告討論。

論文中密切結合總路綫教育的有“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還是黨的同行者”、“總路綫與辯證法”和“兩種世界觀兩種人生觀”等多篇；還有不少研究項目，如“建國十年來歷史科學發展的輝煌成就”和“十年來漢語語法理論的發展”等，反映了我國十年來這幾門科學在黨的領導下所取得的光輝成就。

近年來，該院師生學習毛主席著作也取得不少成績，這次提出來報告討論的“毛主席語言風格”、“毛主席詩詞淺釋”和“如何進行以毛澤東著作為中心的中共黨史課堂教學”等論文，就是學習成績的一部分。此外，還討論了：“華南師範學院院史”、“五華人民革命鬥爭史”、“漢代土地所有制形成問題”、“教學工作中搞群眾運動和學習規律問題”、“關於農村紅專學校幾個問題的初步探討”、“工廠辦學中培訓與提高兼職教師問題”、“中國文學發展過程初探”、“關於民間故事的搜集與整理問題”和“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與消費的關係”等有關歷史、教育、文學和政治經濟學等方面的論文，以及長達十餘萬字的“‘共產黨宣言’解說”和“‘哥達綱領批判’解說”等論著。

為使這次報告討論會開得好，通過不同意見的爭鳴進一步提高學術研究質量，該院除組織校內師生參加討論外，還廣泛邀請科學機關和兄弟院校的許多專家、幹部參加。該院院長和黨委書記還在會上作了關於今後科學研究工作計劃的報告，並動員和組織全院師生反對右傾保守，鼓足干劲，使1960年教學研究工作繼續大躍進，實現開門紅、全面紅和紅到底。（國棟）

# 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結合的产物

齐思成

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會議上，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創議而制定的。自从1958年春，党中央正式提出这条总路綫之后，一年多来全党和全国人民在这条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干劲冲天，意气风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各条战綫上取得了輝煌的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就。我国人民的伟大实践，已經不容置疑地証明了这条总路綫的完全正确。我国社会主义总路綫之所以具有这样巨大的威力，是因为这条总路綫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綫，又是反映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客观规律的路綫，就是說，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是毛泽东同志創造性地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結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設时期新的重大发展。我們知道，毛泽东思想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結合的典范，是在我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中发展和完善起来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已經反复証明，我們的革命事业凡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就能取得巨大成就，凡是违反了它就会使革命事业遭到挫折或失败。因此認真地学习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正是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繼續跃

进的重要保証。这不論在实践上或在理論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是为在我国調动一切可以調动的力量，彻底战胜资本主义、高速度地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总路綫。

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并不是某些人主观臆造出来或是突然出现的東西，而是我国人民伟大的領袖、当代杰出的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根据中国六亿多人民要求急速改变貧穷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根据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經驗，同时也吸收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設經驗而制定出来的；是在我国八年建設过程逐步形成起来的一条完全正确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綫。大家知道，中国人民具有勤勞、勇敢的优良传统，特别是解放了的六亿多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創造性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无穷无尽的力量源泉，是我們事业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正是充分估計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因而在全国解放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就英明預见了中国经济建設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快的。历

史已完全証明这个預见的正确性。一九五二年年底，当恢复国民經济和肃清封建残余的任务基本完成的时候，我們面对着一个新的任务，即进一步改变旧的生产关系，解除生产力的束縛，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以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党中央及时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綫，这是引导中国社会由当时的既有社会主义經济、又有资本主义經济和个体經济同时并存的經济結構，过渡到单一的社会主义經济結構的路綫。党依靠了广大群众的革命力量和智慧，展开了同右傾思想、特别是表现在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右傾思想的坚决斗争；經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很快地在一九五六年就基本上完成了經济战綫上即生产資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在这期間，毛泽东同志根据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促进了生产建設速度的經驗，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中把关于加快建設速度的思想概括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口号，接着党中央又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倡議提出了一个多快好省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战斗綱領——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綱要（草案）；接着毛泽东同志又提出了“十大关系的报告”以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的报告；接着党又糾正了“反冒进”的錯誤，重申多快好省的建設方針，提出了在十五年內在鋼鉄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战斗口号，大大鼓舞了人民的革命干劲。并在1957年粉碎了资产阶级右派的疯狂进攻，在政治战綫和思想战綫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对建設事业的正确领导，同政治战綫和思想战綫的社会主义革命所造成的群众积极性相結合，形成了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暢、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为了加速社会主义建設速度，领导人民繼續前进，党在

一九五八年春天及时提出了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于是全国人民在这条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发挥了冲天干劲，实现了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全面大跃进，实现了农村的人民公社化。

可见，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是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綫的繼續和发展，是在革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起来的。在这过程中間，是有斗争的。当党提出了新的、正确的方針或在我們的事业发展中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党的正确方針总是要遇到来自右的方面的非难攻击。党一贯坚持馬克思主义的立场，击退了资产阶级的抵抗和攻击，糾正和克服了党内的各种右傾錯誤，使正确的路綫方針得到坚持和貫徹。

我国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基本精神是：調动一切积极因素，彻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高速度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文化科学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总路綫的基本內容是：調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結；在繼續完成經济战綫和政治战綫、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实行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針。因而，它完全符合我国人民的建設社会主义的根本利益，完全正确地反映了我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它是我国人民迅速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唯一正确的、伟大的綱領，是我們一切工作的灯塔。

如上所述，我国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既然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結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設时期新的重大发展。为了更系統地更深刻地学习和掌握这条总路綫，为了更坚定地更正确地貫徹执行这条总路綫，就有必要通过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分析，并把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以便更好地理解总路线的精神实质。

## 二

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矛盾发展规律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学说，关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是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哲学基础。

唯物主义辩证法告诉我们，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即统一物之分解为两个相互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列宁说，“就本来的意义讲，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因此，列宁把矛盾学说称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毛泽东同志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矛盾学说。他在阐明矛盾的普遍性这一原理时说，不论是简单的运动形式，或复杂的运动形式，不论是客观对象，或思想现象，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矛盾不仅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而且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又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因此，作为一定历史过程的社会，不仅阶级社会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就是消灭了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只是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性质，不同于阶级社会矛盾的性质罢了。而不同性质的矛盾，应当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法。

由毛泽东同志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矛盾学说，是我们观察一切事物（包括社会现象）的法宝，是揭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真相的钥匙，那么，要正确理解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也必须首先考察这样一系列的问题：党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前夕，国内的形势是怎样的呢？当时我国社会存在什么主要的矛盾呢？应该怎样正确处理这些矛盾，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

不断前进呢？

一九五六年，我国在经济战线上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制度已建立起来，国家政权日益巩固，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另一方面，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不完全巩固；在人民群众中有一部分人，他们一面欢迎新的制度，一面又还感到不大习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一些人对新社会新制度还存在着不满、动摇，甚至还有少数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分子。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八年，全民性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再一次告诉我们，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之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斗争有时高，有时低，有时表现尖锐，有时表现比较缓和。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敌我矛盾，但是在我国目前的具体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作了科学的分析，他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矛盾学说，即以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原理，为我们揭示了当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性质。一般地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即不必采取根本改变生产关系和推翻上层建筑的方法，而是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局部变革和调整的方法来解决矛盾。我们说在一般的情况下矛盾是非对抗性的，指的就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至于敌

我之間的矛盾的性質，則是對抗性的。所以，毛澤東同志指示說：“在這個時候，我們提出劃分敵我和人民內部兩類矛盾的界線，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以便團結全國各族人民進行一場新的戰爭——向自然界開戰，發展我們的經濟，發展我們的文化，使全體人民比較順利地走過目前的過渡時期，鞏固我們的新制度，建設我們的新國家，就是十分必要了。”可見，區分兩類矛盾，主要的是使我們學會正確認識和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是我們黨制訂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綫以及其他一切方針的最基本的出發點。

事情是很明白的，只有分清兩類性質不同的矛盾，特別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才能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才能增強和鞏固人民內部的團結，才能徹底消滅反社會主義的勢力，完成對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分子及其知識分子的改造，使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順利前進。一九五七年黨所領導的按照毛澤東同志關於正確處理兩類矛盾的方針而開展的整風運動和反對資產階級右派的鬥爭，取得了政治戰綫和思想戰綫上的偉大勝利，克服了我國上層建築某些同經濟基礎相矛盾的方面，大大促進了經濟基礎的發展；而經濟基礎的發展，又促進上層建築進一步同新的經濟基礎相適應。這就是“廣大的勞動群眾進一步看到了個人利益和目前利益依存於集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看到了個人幸福依存於全體人民的社會主義崇高理想的實現，因而他們在勞動中表現了共產主義的自我犧牲的英雄氣概。‘幾年辛苦，萬年幸福’，就是他們的口號。在這股偉大的共產主義的洪流面前，許多個人主義、本位主義、地方主義、民族主義的頑石被沖掉了。……”（劉少奇：中共中央向八大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一句話，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殘余，進一步受到致命的沖擊，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想和道德在更大的領域中占

領了陣地。而所有這些，又都匯合成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的偉大的革命干劲，人人力爭上游，在勞動中，在工作中，出現了高度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出現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說敢做的共產主義風格，在經濟戰綫上，在文化戰綫上，出現了馬克思所預期的“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壯觀。

但是，矛盾是不會終結的。矛盾不斷的出現，又不斷的解決；舊的矛盾解決了，新的矛盾又出現。這就是事物發展的辯證規律。解放了的、覺悟了的、團結起來和組織起來的六億五千萬人民，迫切要求盡快改變我國一窮二白的落後狀況，迫切要求用較短的時間把我國建成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願望，而我國一直到一九五八年黨中央正式提出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綫的前夕，仍然是一個經濟窮困、技術落後的國家。這就是我國當時所處的新形勢和面臨的新矛盾。

不繼續解決矛盾，不及時地向全黨全國人民提出新任務，革命就會間斷，人民群众的革命熱情就會因間斷而冷卻，而要帶領全國人民繼續前進，就必須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不斷革命的原理，向全黨和全國人民提出新的任務。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綫可以說就是這一新的任務的具體化。這樣，由毛澤東同志創造性地發展了的不斷革命論，就成為解決新形勢下的新矛盾的理論武器。

不斷革命是無產階級的战斗口號，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原理。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曾公開宣稱“這個社會主義是宣布不停頓的革命”。列寧的“革命轉變論”是不斷革命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發展。毛澤東同志關於“我們的革命是一個接一個的，過去如此，今後也是如此，到共產主義社會也不例外，不過那時革命的性質和形式不同於階級社會罷了”的論斷，更是对不斷革命論的豐富和發展。現在，當我們把不斷革命論的原理同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綫聯繫起來加以討



論的時候，就有必要在這裡探索一下這個原理的哲學基礎，即這個原理的唯物主義辯證法的基础。

我們知道，事物發展過程的推移，也就是矛盾的產生、發展和解決。毛澤東同志在闡明列寧關於對立的統一原理時指出：一切過程都有始有終，一切過程都轉化為它們的對立物。一切過程的常住性是相對的，但是，一種過程轉化為他種過程的這種變動性則是絕對的。而且，“事物發展的全過程中的根本矛盾所規定的本質，非到過程完結之日，是不會消滅的；但是事物發展的長過程中的各個發展階段，情況又往往互相區別。這是因為事物發展過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質和過程的本質雖然沒有變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長過程中的各個發展階段上採取了逐漸激化的形式。並且，被根本矛盾所規定或影響的許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暫時地或局部地解決了，或者緩和了，又有些是發生了，因此，過程就顯出階段性來。如果人們不注意事物發展過程中的階段性，人們就不能適當地處理事物的矛盾。”（見“矛盾論”）但是，“舊過程完結了，新過程發展了，新過程又包含着新的矛盾，開始它自己的矛盾發展史。”（見“矛盾論”）事物發展過程中的階段性，這是革命發展階段論的哲學基礎，不注意革命發展的各個階段（即過程）的質的區別性，就不能適當地處理矛盾，在通常的情況下，可能犯“左”的錯誤。但是，當舊過程完結了或基本上完結了，新的過程發生了或萌芽了，而我們卻還停止在舊的階段（即過程），這是違反事物發展的辯證規律的，在通常的情況下，必然會出現右傾機會主義的危險。而不斷革命論在哲學原理上同事物發展過程的不斷推移是相一致的。因此，不斷革命在實質上就是促進矛盾的解決和解決的手段。

要把我們這樣一個一窮二白的大國建設成爲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現代科

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即不斷解決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發展、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存在的某些方面的矛盾，不致於進行不斷革命，就會落後於形勢發展的要求。而黨中央根據毛澤東同志的創議提出的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綫，正是從我國當前的具體實際出發，創造性地運用這一馬克思列寧主義原理的結果。

總路綫不僅提出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所有制，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國際團結，提出繼續完成經濟戰綫、政治戰綫和思想戰綫上的社會主義革命，而且提出了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的任務。這是不斷革命論在我國新的歷史時期的應用和發展。

劉少奇同志在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的工作報告中指出：“提出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的號召，這就是說，我們的不斷發展的革命，現在又需要前進到一個新的階段。黨的這個及時的號召，迅速地受到了廣大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響應。”這是因為我們要向自然作戰，要建設一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技術落後和文化落後的矛盾已經特別突出起來了。因此，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就作為不斷革命的新的內容而成為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綫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要不斷革命，要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應當依靠什麼力量呢？是依靠群眾，還是脫離群眾？是滿腔熱情地愛護革命的群眾運動，還是指手劃腳地指摘革命的群眾運動？這是哲學上的歷史唯物主義與歷史唯心主義的分歧，也是無產階級世界觀與資產階級世界觀的分歧。

歷史唯物主義認爲，人民羣衆是歷史真正的創造者。歷史發展的主要動力是人民羣衆。而社會主義革命是社會歷史上最深刻的變革，社會主義建設是史無前例的光榮而又艱巨的事業，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歷史事實表明，隨着革命改造的深入和建設事業的發展，參加到這些改造和建設中來的羣



众的队伍也越加壮大。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显然是和人民群众的命运休戚相关。我国六亿多人民既然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社会的主人，成为自觉的创造者，这样的人民群众就必然成为极其伟大的物质力量，成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决定因素。由这样的人民群众所组织起来的革命运动，尽管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缺点，但比起运动所掀起的排山倒海的洪流，那不过是一些小浪花而已。

根据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从我国人口众多这一实际出发，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要把我国这样一个一穷二白的大国建成一个富强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六亿多人民的团结一致的奋斗是决定的条件。因为“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所以，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我国人多，当然有困难，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人多都是好事，这又是问题的一面，而且是主要的一面。因为这些人都是社会主义的人，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是具有英雄气概的人。毛泽东同志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又说：“我国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明确地把我国工农业发展的速度问题同人民群众联系起来，即把多快好省的问题同人民群众的干劲联系起来。

有些人虽然在理论上承认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但他们却不相信我国六亿多人是一个伟大的生产力，不相信党所领导的革命的群众运动的巨大威力，不相信具有高度自觉性、创造性的人民群众不但在革命斗争中能够征服敌人，战胜敌人，而且在经济建设能够征服自然、

战胜自然。这样，他们当然看不到我们最主要的本钱，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他们在实践中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这样的人，当群众一旦掀起汹涌澎湃的运动，特别是当运动形成高潮的时候，他们就惊惶失措，忧心忡忡，大叫什么“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的昏话，而掉进了右机倾会主义的泥坑。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一基本原理，正确地、充分地估计了我国有六亿多人口这一基本特点，制订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就表明总路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这个真理。

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空前的速度发展，取得了史无前例的伟大成就，从而把我国社会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正表明了由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矛盾学说和关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威力，表明了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创议而制定的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一条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完全正确的路线。

### 三

我们已经概括地论述了党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前夕的国内形势，论述了在当时的新形势下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性质，论述了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伟大思想而采取的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以及所有这些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关系问题。现在，我们试图在这个基础上，来研究毛泽东同志怎样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济学说。

高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建设

总路綫的灵魂。我們知道，我国有着六亿五千多万人口、辽阔的疆土和丰富的资源，可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却是经济上的极端贫困和落后。当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大敌人的统治，完成了民主革命，接着又迅速地取得了经济战綫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使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上在全国树立起来以后，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只有尽快地在经济、文化方面摆脱一穷二白状态，才能使我国彻底战胜资本主义，消灭阶级，使我国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获得坚固的物质基础，人民生活水平才能得到更快的提高；同时，我国的外部还存在着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还霸占着我国的领土台湾，帝国主义企图发动侵略战争，不断进行军备扩张，严重地威胁着我国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危害着世界和平。因此，对战争狂人，不能抱任何的幻想；我們只有以最高的速度来进行经济建设，迅速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才能加强我国国防力量，壮大社会主义阵营，制止侵略者发动战争。所以，无论从国内或是从国际方面的阶级斗争形势来看，建设速度问题都是一个路线问题，是国家建设的根本方针问题。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正是反映了我国人民迫切要求把我国的全部国民经济转移到现代化生产的轨道上去，迅速而彻底地摆脱历史遗留给我们的贫困与落后，使我国成为一个在经济上文化上高度发达、具有强大国防威力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强烈愿望。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的学说，认为构成生产方式的两个方面——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矛盾的统一。在生产方式的发展中，生产力一般起主导作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但是，生产关系在一定条件下也能对生产的发展起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这是我們考察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问题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毛泽东同志指出：“有人觉得……生

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不是辩证唯物论的见解。诚然，生产力……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誰不承认这一点，誰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见“矛盾论”）总路线提出的前夕，由于坚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在全国基本建立起来。而当旧的生产关系已经变更，生产力的发展就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大家知道，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消灭了剥削阶级，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归人民所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提髙人民生活。因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能够容許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而生产的不断扩大，就能够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逐步得到满足。并且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建设高速度发展的客观规律，获得了更广阔的作用范围，这样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就完全有可能高速度发展。我国虽然一穷二白，但人口众多，疆土辽阔，资源丰富，有着无限的生产潜力，加上还有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还有我們已经基本上全面地树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但更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我們有着一支以六亿多具有高度自觉性和创造性的人民组成的伟大生产力。这一切使我們完全有条件高速度地建设社会主义。

作为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一整套经济建设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也是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几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而提出来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包括：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

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在生产技术上还有土洋并举的方针等。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是充分依靠六亿多人民这一伟大生产力，从而高速度、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学说在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不充分地估计我国六亿多人民这一伟大生产力的作用，不有效地发挥这一无穷的潜力，而机械地把生产力的问题理解为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就必然会否定我国高速度发展生产的可能性，否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正确性。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作为劳动者和生产工具的创造者、使用者的人，是社会生产力中的决定性因素。“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列宁全集第26卷，第269页）离开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首创精神，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主义事业。作为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重要组成部分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就是发动全国人民在经济建设中大搞群众运动的方针。实行工农业并举，就是为了把我国五亿多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在工业建设中实行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就是为了把地方办工业的积极性，把人民公社以至城市街道居民办工业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使工业建设在全国城乡遍地开花，从而加速我国经济建设的进度。事实也正是这样，我们依靠了六亿多人民，通过大搞群众运动，在一九五八年以来取得了光辉的成就，一九五九年又在原有成就的基础上继续跃进。

按照马克思的再生产原理，国民经济中最主要的比例关系，是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关于两大部类对比关系的公式，也同样适合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此，如何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正确处理反映两大部类对比关系的客观规律的工业

与农业的关系，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关系，乃是高速度按比例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针问题。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解决了我国经济建设的方针大计。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正确处理发展农业和发展工业的关系，是多快好省地发展国民经济的首要问题。我国的历史经验充分证明：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是头等重要的问题。还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指明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他说：“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以上均见“论联合政府”）全国解放后，当我国工业得到恢复和迅速发展后，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阐明农业生产的发展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需要。一九五七年更加明确指出：“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什么要采取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迅速发展农业的方针呢？第一，因为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工农联盟的巩固以及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第二，这样一来，迅速发



展了我国的农业，就能够动员世界上最大的国内市场对于农业机械、化学肥料、建筑材料、燃料、电力、运输工具等各种重工业产品以及各种轻工业产品提出巨大的需求；第三，迅速发展了农业，就能动员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大军，来发展粮食和各种副食品的生产，发展棉花和许多其他工业原料生产。而这些都是加速社会主义工业化所不可缺少的东西；第四，迅速发展了农业，就能动员广大农民创造无限的财富，给国家工业建设提供大量的资金，并且可以在农村直接发展农村小型工业，使社会主义工业化遍地开花。实际生活已经证明，加速发展农业不仅不会妨碍工业化，反而可以加速工业化，加速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一九五三年我国工业大发展（增长速度为31.7%）以及一九五六年工业的跃进（增长速度为31%），都是同前一年的农业丰收有密切关系的。一九五八年农业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实现，则更加显著地推动了工业以及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大跃进。当然，这样说，并不是可以忽略工业的发展；工业仍然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国家在这方面仍然要投进较多的财力、物力。优先发展重工业，这是一条坚定不移的方针。但是，现在有些同志往往片面地理解工农业的互相促进的关系，认为只有工业才能推动农业，因而对迅速发展农业的方针认识不足，甚至有人认为迅速发展农业与优先发展重工业是矛盾的、不相容的。这种见解，显然是错误的。我国需要有几百万台拖拉机，几百万辆载重汽车，几千万吨化学肥料，大量的电力、燃料、建筑材料和其他各种农业机械，以及大量的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工具。满足这种需要，我国的重工业就不能只是几倍地发展，而必须十几倍、几十倍地发展。重工业用这样多的生产资料把农业装备起来以后，农、林、牧、副、渔的多种经营就可以大量地发展，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就可以几十倍、成百倍地提高，农业的总

产量就可以几倍、十几倍地增长，农业就可以提供极为丰富的农产品、畜产品、林产品和其他各种工业原料，就可以为工业和其他事业输送成亿的劳动力。至于轻工业同农业的关系就更密切了。轻工业的大部分原料来自农业。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农业迅速发展了，就能迅速发展轻工业。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就能迅速发展重工业；而重工业大跃进了，就能为轻工业提供更多的机器装备，为农业的技术改造提供所需要的钢铁和机械。一九五八年以来，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迅速发展农业、并注意发展轻工业的方针指导下，出现了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局面。“一九五八年比一九五七年，工业总产值增长66%，农业总产值增长25%，工业总产值的增长为农业的1倍；重工业总产值增长103%，轻工业总产值增长34%，重工业总产值的增长为轻工业的2倍。一九五九年比一九五八年，工农业总产值和重工业、轻工业的总产值继续有了很大的增长，但是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已经接近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的一半，轻工业的增长速度和重工业的增长速度的距离也大为缩短。这样，在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同时跃进中，工业和农业之间的比例更加协调了，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也更加协调了。”（李富春：“迎接一九六〇年的新跃进”）可见，毛泽东同志所规划的我国经济建设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我国国民经济在总路线公布以来所出现的大跃进的特点，既是高速度的，又是按比例。

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工业建设，党针对我国工业基础薄弱和工业经济发展地区不平衡以及人多地广、资源丰富等实际情况，提出了“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与这条方针密切相关的，还有“土洋并举”的方针。我们知道，从管理体制上

說，工业有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之分。一般地說，中央工业是具有全国意义、对国家工业化具有决定作用的大型工业，地方工业是地区性的，主要是为地方农业生产服务的中小型工业。大型工业与中小型工业必須同时并举，这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的。因为，我国經濟基础薄弱，地区辽阔，地区特点差异突出，生产和消費的需要数量大而且具有相当显著的不同，单靠发展中央的大型工业，就不容易更好地滿足各方面多种多样的需要。中小型企业虽然在产量上、技术上不及大型企业，但“也有大企业所难以具备的优点：投資少，便于吸收分散的資金，建設时间短，投資效果發揮快；可以自己設計和供应設備，便于因陋就簡地利用各地各种現成的設備；分布广，利于促进全国的工业化，促进全国技术力量的生长，促进各地区經濟的平衡发展；可以生产的品种多，改变产品也容易；接近原料和市场，可以灵活地利用資源，節約运输費用，供产銷也易于結合；易于按照工作的多少而灵活地使用农业的劳动力和其他非专业工人，因而有利于縮小城乡和工农之間的差別。”（刘少奇：在八大二次會議的工作报告）而且由于地方的中小型企业主要是为农业生产服务，从而可以間接为大型的重工业服务（如制造工业消費品、促进农业生产等）。中小型企业还可以和大企业协作，为它們制造部件零件等，直接为大企业服务。由此可见，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是相互配合互相补充的，实行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和土洋并举的方針，就能調动全民办工业的积极性，适应我国一穷二白的情况，最充分地發揮了我国地大物博人多的巨大的生产潜力，有效地动員了地方和民間的零散資金来进行工业建設，使工业建設在全国城乡遍地开花，改变我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状况。

我国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是馬克思主义

經濟学說和我国具体实践相結合的产物，是毛泽东同志創造性地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的学說、关于人是生产力中的决定性因素的原理、关于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原理，并集中概括为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与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針。一九五八年以来我国国民經濟的全面大跃进，特别是在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在大跃进的形势中出現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創举。当亿万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行动起来的时候，不但使許多原来以为难以做到的事也迅速做到了，而且冲破了各种过时的陈规，按照生活本身的邏輯，为我們的事业找到各种适当的新的形式。所以，人民公社的产生，决不是偶然的；它是我国政治經濟发展的必然产物，是革命的群众运动的产物。人民公社一出現就显示了它的巨大生命力和无比的优越性，大大加速了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設，对迅速发展农业和促进工业化的迅速实现必将作出伟大的貢獻。人民公社还将成为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和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社会組織形式。

#### 四

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階級专政的学說認為，夺取政权仅是无产階級革命的開始，更重要的是經過无产階級专政，来实现彻底战胜資产階級的反抗，并把无产階級革命进行到底，保証社会主义的最終胜利。完成这样的任务将是比較长期的，用列宁的話來說：“从資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乃是一整个历史时代”。

列宁在談到要彻底战胜被推翻的資产階級的反抗时写道：“无产階級专政是为反对旧社会势力及其传统而进行的坚持的斗争，流血的与不流血的，强力的与和平的，軍事



的与經濟的，教育的与行政的斗争”。这就是說，被推翻的资产阶级的反抗，不会因其被推翻而稍有削弱，相反地，正因其被推翻而增加起来，在政治、經濟、思想、教育等战线上进行垂死反扑，乃至軍事上組織武装暴乱。

列宁在論述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另一任务时写道：“必須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重新教育千百万农民和小业主……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他們大家都服从无产阶级的国家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战胜他們中間的资产阶级习惯和传统”，同样，也将要“……在无产阶级专政基础上，在长期斗争中来重新教育无产者自己”。这就是說，农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本身，都要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通过适当的教育的办法，使自己与新的社会制度相适应，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順利发展。这个真理为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四十多年的經驗所証实，也为所有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人民民主国家的实践所証实。

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創造性地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說，在为紀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而写的“論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总结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经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时期，由于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因而使我国民主革命有可能和平地、直接地轉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以它的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阶级内容和方式，执行了和繼續执行着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为我国早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极其重要的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中关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的任务的规

定，反映了这一要求。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讲话中指出：“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一切贊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这是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新的历史条件所闡明的关于敌人和人民的概念。对于敌人和人民的概念的这种新的规定，是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学說的創造性的发展，因为它帮助我們有可能正确地地区別当前我国社会的两类矛盾，从而更有效地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

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贯彻执行中，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一方面起着镇压国家内部一切仇恨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分子，从而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胜利发展的作用；另一方面起着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从而保证了充分調动一切积极因素，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这样，以調动一切积极因素，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为基本精神的总路线这一要求，就通过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得到了实现。

当然，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說，在社会主义建成之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是国内的主要矛盾。事实說明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形成过程，是不断地同资产阶级反社会主义的右傾机会主义思潮进行斗争的过程。上面在論述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形成过程中的斗争，充分証明了这一点。一九五八年开始，全国人民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鼓舞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国民經济的大跃进，并在全农村中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在科学技术和



文化教育事業方面，也獲得了空前未有的大發展。這些兩條路線、兩條道路的鬥爭，雖然屬於人民內部的矛盾，但就其實質來說，又都是我國過渡時期的階級鬥爭的反映，即代表資產階級和農村富裕中農的階級利益，與無產階級領導的廣大人民群眾盡快把我國建成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要求之間的鬥爭。因此，不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路線，不堅持無產階級的專政，就沒有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沒有總路線的勝利。

“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列寧），  
“黨是工人階級底政治領袖”，“黨是無產階級組織底最高形式”（斯大林）；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黨的領導作用，不僅不容許有任何削弱，而且必須堅決加強黨的領導作用。

毛澤東同志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黨的領導的原理，強調了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黨的領導作用，並形象地提出“政治掛帥”的原理。

我國的歷史事實證明，沒有黨的領導，就沒有民主革命的勝利，沒有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沒有黨的領導，也就沒有已經取得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巨大成就，沒有必將取得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更偉大的成就。因為無產階級的政治不掛帥，資產階級的政治就會掛帥，而按照資產階級的政治要求，當然就不是把我國人民引導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社會，而必然是為資本主義的復辟開辟道路。

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形成過程中

的兩條路線、兩條道路鬥爭的情況說明，沒有黨的領導，沒有無產階級的政治掛帥，就沒有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這是因為：一方面，我們的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工人階級的黨，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黨。另一方面，我們黨又是最熟悉中國社會情況和廣大群眾的迫切要求，具有明確的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的黨。只有這樣的、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國共產黨，才能夠從我國的實際出發，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及時地提出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

不僅如此，沒有黨的領導，沒有無產階級的政治掛帥，總路線的正確貫徹執行，就會失去有力的保證。我們的實踐證明，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貫徹執行，並不是一帆風順，而是要展開一系列的長期的鬥爭的。這是因為我國還存在着資產階級的剝削，還存在着階級鬥爭，我國在不久以前，小資產階級還是一個汪洋大海，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和習慣勢力，還頑強地在抗拒一切新生的事物。而所有這一切，又不可避免地會反映到我們黨內來，那些存在着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人，總是企圖用他們的觀點來改造黨、改造社會。最近在黨內出現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潮就是這種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因此，在為貫徹執行黨的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的鬥爭中，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堅持政治掛帥。黨的政治工作永遠是一切工作的靈魂，黨的領導是正確貫徹執行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有力保證。

# 『基数决定論』的反科学性

黃佑琚

刘少奇同志在党的八大二次會議的报告中指出：“建設的速度問題，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們面前的最重要問題。我們的革命就是为了最迅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經濟本来很落后，我国的外部还有帝国主义，只有尽可能地加快建設，才能尽快地巩固我們的社会主义国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高速度是社会主义建設的客观規律，是党的建設社会主义总路綫的中心問題。因此，清除人們对我國国民經济繼續

高速度地发展的可能性的某些錯誤認識，是有重要意义的。

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学家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应声虫，面对着帝国主义“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生产发展速度日益趋于下降的事实，为了替垂死的資本主义辯护，近年来大肆宣传所謂“生产效率递减規律”“資本主义經濟增长速度下降是由于基数增大”等謬論，企图以此来証明现代資本主义生产发展速度趋于下降的真正原因是由于基数增大，而不是由于資本主义制度已經严重地束縛生产力的发展。

在我們的学术界也有一些人，由于受了这种資產階級观点和偏见的影響，只看到基数和速度之間的表面联系，看不到社会主义生产发展速度变化的本質。他們認為我国过去生产发展速度所以快的原因，是由于我国原来經濟很落后，底子很薄，生产水平很低

（即基数很小）；經過几年来有計劃的經濟建設，特别是1958年的大跃进，我国生产水平提高了，基数增大了，今后我国生产发展速度将是越来越慢，至少发展速度很难繼續提高。他們把这种“理論”表述为如下的公式，即：基数愈小、速度愈快、基数愈大、速度愈慢。这个公式是反科学的，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实际情况的。承認这个公式，就必然否定今后我国經濟建設繼續保持跃进的发展速度的可能性，从而影响人們高速度地建設社会主义的信心，妨碍我們不断提高社会主义建設速度的努力。

—

究竟基数和速度之間的一般关系是怎样的呢？生产发展速度的快慢是否由基数小大来决定？真正决定生产发展速度变化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我們認為：基数和速度之間有一定的关系，但决定生产发展速度变化的决定性因素不在于基数大小，而首先在于社会条件，特别是社会經濟条件及其发展变化。

大家知道，所謂一定时期的生产发展速度，就是这一时期产品总产量和基期产品总产量之比。基数和速度之間的一般关系是这样的：在基数小时，要保持同样的发展速度，所需要追加的生产費用和再生产出来的产品数量就少，从而就較容易做到；反之，在基数大时，要保持同样的发展速度，就需要追加更多的生产費用和再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从而就較难于做到。在这一点上，我們并不否認，基数增大之后，对于生产发展速度的繼續提高有一定的限制作用。但是这仅仅是基数和速度的一般关系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在基数大时，又为迅速扩大再生产，加快生产发展速度，提供种种有利的因素，例如（1）在基数大时，可供追加的生产資料和生活資料較多，有利于扩大再生产。（2）由于基数大小一般地反映着劳动生产率水平和生产技术水平的高低，在基数

大时，劳动生产率水平和生产技术水平一般比较高，从而它不仅直接有利于迅速扩大再生产，而且有利于积累水平的提高。因为劳动生产率水平和生产技术水平较高时，在全部社会总劳动中，必要劳动部分所占的比重较小，剩余劳动所占比重较大，而剩余劳动是积累的唯一源泉，积累又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剩余劳动部分所占的比重比较大，积累增长的速度当然就比较快，从而也就更能提高扩大再生产的速度。相反，在基数小时，就为扩大再生产带来种种困难。由此可见，基数的大小，对于生产速度的增长，存在着有利的因素和不利的因素两个方面。一定时期社会生产的发展速度，与这两方面因素的消长情况有直接关系。但不管有利方面还是不利方面，对生产发展的速度，都不起决定性的作用，作为生产发展速度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条件，特别是社会经济条件。

我们知道，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尽管社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基数不断增大，可是生产发展速度的主要趋势却是后一个社会比前一个社会要快，而同一社会生产方式，又总是初期的发展速度较快，后期则较慢或逐渐下降。这一方面说明，不一定基数大了，生产发展速度就必然缓慢，也说明生产发展速度的变化首先是由社会经济条件来决定。因为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后一种生产方式总是比前一种生产方式优越得多，更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并且，在剥削社会中，由于存在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对立，当生产关系基本上适合生产力的要求，生产发展就较快，到了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束缚，生产发展就较慢或逐渐下降。

我们从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比较长的一段时期生产发展速度变化的情况及其原因的分析，将进一步证明：决定社会生产发展速度变化的原因不在于基数，而在于社会条件，首先是社会经济条件。以英国和美国为例，

这两个资本主义国家一百多年到二百五十年来工业生产发展变化情况如下表：

国别	时 期	年平均增长速度 %	
英 国	1701—1750年	1.1	
	1751—1800 "	2.1	
	1801—1850 "	2.9	
	1851—1890 "	2.6	
	1890—1900 "	1.7	
	1901—1910 "	1.2	
	1911—1937 "	1.5	
	1938—1948 "	0.8	
	1949—1955 "	4.5	
	1950—1958 "	2.9	
	1958年	-0.9	
	美 国	1850—1860年	5.7
		1863—1899 "	5.9
1900—1914 "		4.2	
1915—1919 "		3.6	
1915—1929 "		4.6	
1920—1937 "		3.0	
1938—1949 "		4.1	
1951—1955 "		4.4	
1950—1958 "		3.7	
1958年		-6.5	

说明：（一）表中数字来源①周恩来：“伟大的十年”；②“英、法、美、德、日百年统计提要”的有关数字；

（二）表中美国1850—1959数字仅仅是制造业的数字，这是根据猪谷善著：“美国社会经济史”第203页的数字计算出来的。

从上表中英国二百五十多年来工业生产的每年平均增长速度的变化情况中，我们可以看到，英国从1701年至1850年的一百五十年中，工业生产的基数虽然不断增大，但它的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却由1.1%逐步上升到2.9%，这就是说，工业生产发展速度的主要趋势是上升的。为什么这样呢？主要是由于在这一百五十年中，英国还处在资本主义上升发展时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还基本上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加以不断地扩大对殖民地



的掠夺，因而使得他的发展速度比较快。到了1850年到1890年，英国已经开始逐步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开始逐步地尖锐化，从而他的工业生产发展速度开始趋于下降。1890年以后，英国已经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一切矛盾、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日益尖锐化，帝国主义是寄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统治阻碍技术的进步；食利者阶层人数的增加，剥削阶级寄生性消费的增长，军国主义的猖獗；等等，都使得社会财富日益更多地用于非生产性的耗费，从而影响资本积累的增长水平。特别是进入了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企业开工不足和失业人数增长，物质财富和劳动力大量浪费，市场问题尖锐化……等，使得资本主义国家陷入日益深重的经济危机中，这一切表明了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就决定了它的生产发展速度的主要趋势是逐步下降的。从1890年开始，英国工业生产的每年平均增长速度由过去2.6%急剧地逐步地下降到1.2%；1.5%。而1938年—1948年再下降到0.8%，则除了上述原因以外，还由于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战争破坏。至于1949年至1955年年中，英国工业生产的发展速度之所以回升，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其中也包括英国），出现了一些对生产增长暂时地起特殊作用的基本因素，例如由于经济的军事化加强而来的军事生产增长；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暂时有利于英国垄断集团加强对外贸易和投资，加强对殖民地的掠夺，从而促进国内生产的增长；大量固定资本更新，刺激重工业生产的增长；以及加强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和降低劳动人民生活，等等。由于这些起特殊作用的因素又同时使资本主义的矛盾尖锐化，并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深化准备了因素，因而它对生产发展的刺激作用就很快地逐步地消失了，新的经济危机

就随之爆发。1958年英国工业总产值比上一年不仅没有上升，而且降低了0.9%，就是最好的说明。

美国一百多年来工业生产发展速度变化的情况也大致和英国一样。在十九世纪期内，由于它还处于垄断前资本主义时期，生产发展速度的主要趋势也是上升的。二十世纪以来，由于美国已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严重地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它的工业生产速度由5.9%逐步下降为3.6%；3%等等，这就是说，主要趋势也是下降的。这期间内的1915年至1929年，他的工业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之所以从在此以前的4.2%升到4.6%的高峰，主要是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事工业生产急剧增加，特别是在战后十年内，大量固定资本更新和新兴工业部门的发展，刺激她的重工业生产迅速发展，从而使他的工业生产速度迅速上升。1938—1949年美国的工业生产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又从3%上升到4.1%，则主要是由这期间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军事生产急剧增加之故。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51—1955年，美国工业生产每年平均增长速度继续上升为4.4%，除了发动侵朝战争这一因素以外，也是由于上述在战后帝国主义国家中，出现一些对工业生产暂时地起特殊作用的因素之故。随着这些因素的特殊作用的逐步消失，美国从1957年以来，陷于日益深重的生产萎缩和经济危机之中，使得她在1958年工业生产比1957年下降6.5%。尽管美国在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以后，某些年份由于一些特殊原因，工业生产的速度有所上升，但是，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生产速度的主要趋势日益下降，却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下面引用的资料也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哥特史密斯的计算，美国国民财富的年平均增长速度，19世纪上半世纪为2.19%，下半世纪为2.53%。20世纪上半世纪，由于资本主义进

入帝国主义阶段，这个增长速度迅速下降为1.28%，而在1926—1950年这一段仅为0.66%，也就是說比19世紀上半世紀低3/4。我們如果研究一下另外一些美国再生产指标（产品动态、国民收入动态和生产資本动态等），那末就会得出另一种具体的动态指标。但主要趋势也是这样，即扩大再生产速度下降。”<sup>①</sup>

上面对基数和速度的一般关系的分析，特别是对英国和美国生产发展速度变化情况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如下三点結論：（1）虽然基数和速度之間有某种联系，但决定生产发展速度变化的原因不在于基数的大小，而在于社会条件、首先是社会經济条件；（2）在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发展时，生产发展速度一般比較快，例如在自由竞争阶段的資本主义，由于它的生产关系还基本上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虽然基数随生产水平的提高而增大，但生产发展速度的主要趋势仍然是上升的；（3）当資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由于資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經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資本主义生产发展速度的主要趋势是下降的。

## 二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发展速度的趋势怎样呢？基数决定論者通常拿我国恢复时期生产发展速度比較快，而建設时期生产速度比較慢为“理由”，来証明他們所提出的“基数愈大，速度愈慢”的观点，这完全是錯誤的。我国恢复时期生产发展速度之所以較快。首先是因为这一时期我們刚刚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統治，建立了实质上是无产階級专政的人民民主政权，开始清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对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束縛；并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經济的領導地位，逐步进行土地改革和其他方面的民主改革。社会制度这种巨大的变革，必然大大的推动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

发展。因此，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和旧的生产关系的变革，是恢复时期国民經济迅速发展的首要原因。其次，恢复时期的生产水平，远远低于我国历史上曾經达到的生产水平，这是由于国民党反动統治和十多年战争严重破坏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緣故。在以工人階級为領導、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政权的領導下，恢复被破坏了的生产力，一般來說是比較容易的。再次，旧中国原有的工矿企业的生产设备本来就是残缺不全，在各部門、各个企业和企业内部各車間、各工段之間也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状态，加以旧的經營管理的腐敗，就严重地限制生产潜力的发挥。党在恢复时期一面对原有企业逐步进行經營管理上的改革，一面把基本建設投資的主要部分用来恢复和扩建原有的企业，这样比較容易做到投資少，收效快的經济效果，能够迅速地把生产的潜力发挥出来，使生产迅速发展。上述这些因素同时发生作用，就使得恢复时期的生产以比較快的速度发展。基数論决定者无视这些本质因素，硬說恢复时期发展速度較快的决定性的原因，是由于基数小，这是站不住脚的。

我国进入有计划建設以来，生产发展速度变化的情况，更可以說明基数决定論是站不住脚的。我国第一个五年計劃时期的1953年和1956年，工业生产的基数都比恢复时期的1952年的基数大，可是这两年工业生产（不包括手工业）的增长速度分别为32%和30.7%，都超过了1952年工业生产（不包括手工业）增长28%的速度。1953年和1956年这两年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所以快于1952年，除了因为1952年和1955年农业丰收，促进了1953年和1956年輕工业迅速增长，相应地加大了这两年工业的总产量以外，主要是由于1953年已經基本完成民主改革的任务，19

<sup>①</sup>雅·科龙隆德：“論现阶段社会主义再生产的特  
点” 經济譯丛，1959年，第11期第3頁。

56年基本完成了三大改造。生产关系这种巨大的变革，必然大大的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加快工业生产的发展速度。特别是大跃进的1958年，生产的基数大大地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可是这一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的速度达到48%，不仅大大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平均每年增长10.9%的速度，而且也大大的超过了恢复时期发展速度最快的1950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增长23.3%的速度。

那么，在我国具体条件下，社会主义生产发展速度的趋势究竟怎样呢？就我国七年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生产发展速度的变化情况来看，在工业方面，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18%（包括手工业），而1958年和1959年（一九五九年是计划数，实际上已大大超过——下同）两年平均增长45%。钢的每年平均增长速度，第一个五年是31.7%，近两年是50%；煤的每年平均增长速度，第一个五年是14.4%，近两年是60%。在农业方面，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4.5%，而1958年和1959年两年平均增长17%。粮食的每年平均增长速度，第一个五年是3.7%，近两年是22%；棉花每年平均增长速度，第一个五年是4.7%，近两年是19%。可见，七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速度尽管有些年份高、有些年份低，但总的来说，发展速度的主要趋势是上升的。这正如刘少奇同志所说：“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不可能每年都一样的。有的年份较高，有的年份较低，这是正常的现象。可以肯定，我们的经济总是逐年增长的，而且我们是能够保持跃进的发展速度的。”<sup>①</sup>

以上的分析说明：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只要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只要各种有利条件具备，即使基数大了，生产发展速度也可以快。不仅如此，今后我们在基数更大的情况下，仍然可以继续以大跃进的速度发展生产。

为什么我们在今后还能够继续以大跃进的速度发展生产呢？首先因为我们有了经过实践证明了完全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用两条腿走路”等一系列有关方针，这是充分调动我国一切积极因素、首先是近七亿人民的觉悟性、积极性、创造性，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法宝。党的总路线依据我国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客观规律，进一步地确定以农业为基础，按照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迅速发展农业互相结合的原则，正确地安排农业、重工业、轻工业、重工业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实行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同时并举。实行这样的“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就不仅能够保持各个经济部门之间的必要平衡，“而且首先是最充分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开辟最广大的阵地、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建設队伍能够开展，使他们的力量能够最充分地使用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来，从而使多、快、好、省要求的实现得到保证。”“党的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本质，是对人民群众的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觉悟性、积极性、创造性的高度的重视。”<sup>②</sup>经过1958年和1959年的连续大跃进，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大大地提高了，党的总路线和“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更加深入人心了，广大人民群众更加充分地认识和更加自觉地执行总路线和“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样，依靠党的领导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大搞革命群众运动，就最充分地发挥了近七亿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保证了我国国民经济以大跃进的发展速度向前迈进。我

<sup>①</sup>刘少奇：“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红旗杂志，1959年，第19期第13页。

<sup>②</sup>周恩来：“伟大的十年”，红旗杂志，1959年，第20期第11—12页。



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特别是1958和1959年的大跃进的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照耀下，依靠革命群众运动，大跃进的发展速度已经成为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二个法宝。社会主义革命的进一步深入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和完善了。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的正确的领导下，我们更能自觉地及时地调整和革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它的上层建筑，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促进生产力迅速向前发展。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中出现了人民公社这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新的社会组织，这是动员五亿多农民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好的组织形式，这是我国人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强有力的武器，它进一步地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经过一年来的整顿和巩固，它的巨大的优越性进一步发挥，必将以千军万马之势推动我国农业的迅速发展，并为促进我国工业化的迅速实现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人民公社是我国人民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三个法宝。正是由于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找到了这样三个法宝，所以我们就完全有可能在基数不断增大的情况下，保持不断跃进的发展速度。

经过1958年和1959年的连续大跃进，我们在两年内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大大加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一个以钢铁和机械为中心、大中小型企业合作、地区分布比较合理的全国完整的工业体系，正在迅速形成中；”<sup>①</sup>我们有了这个比以往更加雄厚的物质基础，使我国机器和设备的自给率提高到80%以上，这就能日益更多地以现代化的技术设备加强和改造国民经济一切部门，更快地提高它们的技

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水平；也可以用更多机器设备来支援农业的技术改革，促进农村实现“四化”。这一切就能够进一步发掘我国社会发展生产的巨大潜力。仅以广东省为例，全省实现农业半机械化以后，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将增长60%，这等于增加八百万到一千万个劳动力，这是多么巨大的潜力。

在两年来的大跃进中，在技术革命的口号的鼓舞下，在土洋并举，土法上马，土洋结合，由土到洋的方针指导下，所有企业都提高了技术水平，广大的职工、农民的文化技术水平也进一步提高，随着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土洋并举方针将更好地发挥作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成就将更加广泛地运用到生产上来，这方面的无穷无尽的增产潜力，将大量地被挖掘出来，使生产效率成倍地，十倍地，甚至百倍地提高，这是我国能够在基数不断增大的情况下，保持不断跃进的发展速度的物质基础，即社会经济条件。

可见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和毛泽东同志的教导下，既然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奠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继续跃进的物质基础，同时又找到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的发展速度和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这三个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法宝，加上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主义团结和对我国的无私援助，这就完全可以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即使基数增大，仍然能够以大跃进的高速度向前发展。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sup>①</sup>李富春：“迎接一九六〇年的新跃进”，红旗杂志，1960年，第1期第2页。

# 馬寅初哲学思想和經濟理論的實質

康 仁

馬寅初先生在《新建設》1959年11期上发表了一篇新著“我的哲学思想和經濟理論”，系統地論述了他的“团团轉”理論和“新人口論”。作者宣称“全文（附带声明除外）就大跃进的情形，作一个科学的解释”，并在文中大量引用馬克思主义的詞句，标榜着“根据辯証法的核心”証明其所立的“新学說”之正确性。其实，馬寅初是在馬克思主义外衣掩飾下，販賣其資產階級的私貨，企图以形而上学的“团团轉”来代替馬克思主义的辯証唯物論，把总路綫的胜利說成是由于“团团轉”理論的“济世救人的伟大力量”；并进一步从总路綫的本質方面，来反对总路綫，以“新人口論”誣蔑、降低、打击人民群众在革命和建設中的作用和冲天干劲。同时，又打起“純学术問題”的幌子以迷惑視听，歪曲党的百家爭鳴的方針。耐人寻味的是，正当我們展开反右傾斗争的时候，在两种世界观的斗争的决战阶段，馬寅初要求公开发表这篇文章。这决不是偶然的。这篇文章无非企图从我們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事业的理論基础上打开一个缺口；它是我国資產階級反社会主义斗争的一个組成部分。因而，我們和馬寅初的分歧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反映了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必須剝去其馬列主义的外衣，揭露其实質，以捍卫馬克思主义的純洁性。

“团团轉”的理論是馬寅初的基本哲学思想，是他的經濟理論的方法論。“团团轉”理論就是：“一个环节接着一个环节，首尾两端相接的方法”，“回到原处”，

“結果形成一个圓圈”。据作者宣称，它是“从辯証法核心得出来的”，而且有“济世救人的伟大力量”。他从國民經濟的各个不同方面任意拼湊了二十个“对立的統一”，并从第一个到第十八个排成一排，围成一个圓圈之后，就在結論中宣称“我們由炼鋼出发，最后仍回到炼鋼，形成了一个团团轉”。据說这就是他以“辯証法的核心”为根据的大型“团团轉”。大型“团团轉”中，还包括了一个以“‘八字宪法’为根据的小型团团轉”。馬寅初的“团团轉”理論，并不是什么新鮮的东西，是他所一貫販賣的机械平衡論和形而上学的循环論，与馬克思主义毫无相同之处。尽管馬寅初堆砌了大量馬克思辯証唯物主义的詞句来装扮，其效果只是欲盖弥彰而已。

唯物辯証法認為：一切事物都是錯綜复杂地联系着、制約着，联系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馬寅初的“团团轉”，根本否定事物的普遍的、必然的內在联系。“一个环节接着一个环节”，“首尾两端銜接起来”，形成一个“团团轉”。表面看来，似乎馬寅初也承認事物之間的联系，但它与辯証法的联系根本不同，是簡單的、一条直綫的联系。充其量也只是承認事物的外部联系。

“团团轉”的联系，可以正着轉，也可以倒着轉，还可以从任何一点开始轉，而最后首尾相結。在大型“团团轉”中，由冶金工业部炼鋼开始轉到鐵道部炼鋼，形成一个“团团轉”。在小型“团团轉”中，或者从“水”

凡文內引文沒有注明出处的，见新建設1959年第11期馬寅初“我的哲学思想和經濟理論”

到“管”銜接起来，或者“从密植到密植”銜接起来，形成一个团团轉。在这些环节的的联系中，找不出事物的內在的、必然的的联系，也看不出錯綜复杂的相互制約的的联系，只是簡單的、僵死的、偶然的联系。虽然馬寅初在文章中辯解說：“所有的联系都是內部的、本質的、必然的”，但硬搬的詞句并不能掩盖其观点的本質。这样抓住一些外在的、偶然现象任意拼湊，牵强附会，主观臆造出来的“团团轉”，根本不能說明任何問題，更說不上反映外在世界的本来面貌和客观规律了。而馬寅初却奉为至宝，任意套用“团团轉”的框框，自以为得到了“事中之理”。很明显，他的“理在事中”，不过是披着唯物主义外衣的主观唯心主义。

唯物辯証法認為：一切事物都是矛盾对立的統一體，矛盾是絕對的，統一相對的；事物內部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事物間的联系和作用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原因。

馬寅初的“团团轉”根本否認矛盾，否認发展。他虽然抄袭了別人分析矛盾的詞句，搬出了二十个“对立的統一”，但不能改变他形而上学的本質。在他看来，只有“矛盾的解决”，“差别的消失”，才有“对立的統一”。即是有統一就沒有矛盾，有矛盾就不能統一。因而他的“对立的統一”根本排除矛盾，正如他过去所說：“在平衡或者均势的时候，对立面的斗争停止了。”<sup>①</sup>而事物的发展，在他看来，則純为外力所推动，所以他在論述了一个“对立的統一”后，接着就說：“至此又有一个問題了”，前一环节成为后一环节的动力或产生的原因。这样，實質是否認事物发展的因素。

唯物辯証法还認為：矛盾斗争是事物发展的源泉，事物的运动和发展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发展，由低級到高級、由簡單到复杂的过程。馬寅初的“团团轉”則是正

轉、倒轉、从中間任何一点开始轉都可以，事实上就不承認发展是前进性的运动。“团团轉”之所以为“团团轉”，在于“首尾銜接”，“回到原处”，既如此，就不可能有什么“螺旋式上升”。馬寅初为他的“团团轉”塑上“螺旋式上升”的金身，結果只是陷于邏輯混乱的自相矛盾之中，絲毫也掩盖不了他的循环論的旧貨底。

因为他根本不懂得矛盾，也就根本談不到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团团轉”可以从圓圈里任何一点开始，这也就根本地否認主要矛盾、主流。因此，在“团团轉”中更看不到主要矛盾的作用。虽然他曾說：“以鋼为綱带动一切”，只不过是一种裝飾而已。

由此可见，馬寅初在“团团轉”理論中，只是更进一步地、系統地暴露了他的哲学思想是早已破产了的机械平衡論和形而上学的循环論，是与馬克思主义唯物辯証法根本对立的，是反馬克思主义的。

馬寅初的大型“团团轉”的最后一个“对立的統一”，是人口的“質和量”，再一次搬出了他的“新人口論”。据說，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的“旧理論”已經“过时”，他要立一个“新學說”来解决中国当前的問題。实际上，他的“新人口論”也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不过是臭名远扬的馬尔薩斯人口論的翻版。虽然也点綴了一些馬克思主义的詞句，也同样掩盖不住其反馬克思主义的實質。

馬克思主义認為：劳动人民是社会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是生产力最积极的因素；人多是好事情。我国革命和建設之所以能不断取得輝煌成就，正如毛主席所說，“除了党的領導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而馬寅初却把我国劳动人民看作單純的消費者，人多是一个“极大負担”，

<sup>①</sup> 見馬寅初“再論我的平均論中的‘团团轉’理論”



“拖住了技术进展和科学前进的后腿”，“拖住我们进共产主义社会大门的后腿”，这显然是与马克思主义相违背的。馬寅初在文章中辯解說：“与馬列主义的理論——人是最寶貴的財富——亦不相抵触，而且相互印証，因为馬克思与列宁亦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不仅是遁詞，而且是极大的誣蔑。革命导师从来没有說过要减少人口来发展生产力，相反地馬克思指出：“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階級本身。”<sup>①</sup>列宁也說：“全人类的第一个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sup>②</sup>至于我們所主張的适当节育，是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更好地安排家庭生活，与馬寅初的主張毫无相同之处。

馬克思主义認為：人按其自然素質，不存在先天質量高低之分。从階級观点来看，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氣質，劳动人民的品质是剝削者所不可比拟的。馬寅初則認為我国“下层的”工农群众質量不如“社会上层分子”，中国人更是不如英国人質量高。这不仅是对劳动人民的公开辱罵，而且和帝国主义一鼻孔出气，是完全反馬克思主义的。

馬克思主义还認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質，生产力始終是最革命、最活跃的要素，与生产力性質相适合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主要的、决定的推动力。馬寅初則認為目前我国是“生产力的发展不适应于生产关系”，要創立一个“新学說”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解决“人口多，質量差”的矛盾。馬寅初不仅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茫然无知，而且也誣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优越性。在他看来，“生产关系搞好了”，对于发展生产力也是无能为力的。“救济的方法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更恶毒的是，馬寅初把生产关系說成是超出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这是宣扬反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說。

“新人口論”不仅在理論上是錯誤的，是反馬克思主义的，而且也是与事实完全不

符的。解放以来的事实是：劳动人民在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之后，文化和技术知識水平空前高涨，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我們不仅消灭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失业现象，而且日益感到劳动力的不足。大跃进的成就正在迅速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主要产品总产量超过英国为期不远，按人口超英赶美也不难，共产主义对我们并不是遙远的事。

馬寅初的反科学的“新人口論”，实际上就是馬尔薩斯的人口論。馬尔薩斯人口論的基本观点，是将所謂人口多，繁殖快，看作是劳动人民貧穷落后的根源。新馬尔薩斯主义还进一步和优生学与种族主义結合，宣扬人口質量的論調。馬寅初和他們不正是唱着同一調子嗎？馬寅初辯解說：馬尔薩斯的主張，是“自然性質的观点，給劳动群众一个沒有希望的远景”，而他則不是。但实际上他用人口多“質量低”来分析社会問題，恰恰是“自然性質的观点”。“新人口論”不是别的，是彻头彻尾的馬尔薩斯的反动人口理論的翻版。

## 二

馬寅初的文章是以“就大跃进的情形，作一个科学的解释”姿态发表的。但是根据上面的分析，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馬寅初是在玩弄馬克思主义的詞句，給大跃进以反科学的解释，实质上是對大跃进的誣蔑和攻击。对于大跃进，我們党早已作出了科学的解释，那就是周恩来总理所說的：由于“經濟战綫、政治战綫和思想战綫的社会主义革命連續不停頓地取得伟大胜利，社会生产力和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获得了空前的解放，而我們党又根据这种有利形势，及时地提出了和执行了‘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正是由

<sup>①</sup> 見馬恩全集第四卷第197頁

<sup>②</sup> 見列宁全集，第29卷第327頁

于这一切，我国人民才能够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一开始的时候就开辟了一个大跃进的新局面……。”<sup>①</sup>

他的“新人口論”是和总路綫根本对立的，散布悲观失望情緒，认为人口多是負担，是前进的絆脚石，否認社会主义建設的可能性；高速度发展更是不可能的事。“团团轉”理論也是根本反对总路綫的。他不仅撇开了党的領導作用、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优越性，仅从生产力甚至技术的各个环节的简单联系来歪曲大跃进，而且“团团轉”的本身——“一个环节接一个环节”，“首尾銜接”，“回到原处”，“团团轉”中是不允許有起决定作用的主要环节的存在。尽管他在文章中曾把炼鋼作为經濟整体的第一个环节，可是，这并未改变問題的实质。第一个环节和其他环节一样，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作用。馬寅初既然否定主要环节的作用，也就必然主张消极平衡。与我們所主张的“一馬当先，万馬奔騰”，沒有任何共同之处。馬寅初是一貫以消极平衡論来反对高速度的。在我們跃进的1956年，由于先进帶动落后，国民經济各部門不仅共同高涨，而且按比例发展。但馬寅初在同年12月底发表的“联系中国实际来談談綜合平衡理論和按比例发展”一文中，却非难我們“欲速則不达”，“給国民經济发展带来不良的后果”，<sup>②</sup>造成各部分之間許多“跟不上”，也就是“比例失調”。这就充分說明了馬寅初在比例与速度的关系中，主张平衡发展，不应一馬当先，一馬当先是“冒进”，会导致不可收拾的后果。这是赤裸裸地反对高速度，也再一次証明了馬寅初的机械循环論反对辯証法的发展观，正是为了反对高速度。

馬寅初的“理論”，其鋒芒是直接攻击高速度、大跃进、总路綫的。企图从理論上論証高速度、大跃进是不可能的，对群众的冲天干劲泼冷水。

馬寅初还标榜超階級，否認階級斗争，否認社会主义革命，抹煞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认为他的理論可适用于任何社会制度，如日寇能执行“团团轉”，則可避免1939年天津市的大水泛滥；他的“新人口論”，“即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亦不难把馬尔薩斯的学說送到坟墓里去”。而且这些“理論”有“济世救人的力量”，“永远可用”。标榜超階級也就必然否認階級斗争，据他說，“我們的缺点……乃是劳动生产率不高。救济的方法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决不是政治革命。”又說：“人口与生产的关系比任何其他因素都重要。很明显，馬寅初是否認当前的主要矛盾是資产階級与工人階級間的矛盾，而以“生产矛盾”来代替它；社会主义制度对发展生产是无能为力的；階級斗争已經过时，社会主义革命已无必要。最近在北大校刊发表的馬寅初的“重申我的請求”一文中，更加露骨的說：“分階級的說法对我是不能套用的。中国现在正在形成沒有階級的社会，地主与資本家已經不存在”。<sup>③</sup>这样我們就能够更清楚的認識到馬寅初的目的，无非是以否認階級斗争来麻痹人們的政治警惕性，要我們在階級斗争面前解除武装，以便于資产階級达到复辟的目的。我們清楚的知道：过渡时期階級斗争并未熄灭；无产階級与資产階級之間的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事实也反駁了馬寅初的論調。当前反右傾机会主义的斗争，就是階級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繼續；社会主义革命正在向纵深发展。国外还有帝国主义，国内对地、富、反、坏、右的改造也还未完成，資产階級还在拿定息，資产階級的思想影响和旧社会所遺留下来的习惯势力

① 见周恩来：“伟大的十年”紅旗1959年第20期第9頁

② 见馬寅初“我的經濟理論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

③ 见北京大学校刊第338期1959年12月25日

还大量存在，我們必須把階級斗争进行到底。

馬寅初对群众运动的态度，是采取更加露骨的资产阶级立场，我国革命和建设的辉煌成就，是党领导的群众运动的伟大胜利。不大搞群众运动，就不会有国民经济的大跃进。馬寅初对人民群众的看法既与我們有根本分歧，那么诬蔑和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新人口論”从头到脚都渗透着鄙视人民群众，反对群众运动的反动观点。在他吹嘘为大跃进的科学解释的“团团轉”中，他避而不谈总路线的基本精神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团团轉”中不仅排斥了人的作用，而且更在强调各个环节必须保持平衡的论述中，限制群众增产的干劲。他說：“八字宪法”中任何一項都不能“飞快发展”，必須“均衡地高速度发展”，不然的話，“必然使經濟失調，高速度也因而不能保持”。这是十足的向群众泼冷水，束縛群众的手脚。强调“平衡”，又以“經濟失調”来吓唬人，目的无非是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因为群众运动是“暴风驟雨，迅猛异常”的，不是那么“温良恭俭让”的。更重要的还在于群众运动是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它具有无穷的威力，是我們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源泉，因而，是资产阶级及其理論家所害怕而坚决反对的。

馬寅初的“理論”的反动性，更集中的表现在否认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我們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証。“沒有共产党，就沒有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亲身感受中所得到的結論。馬寅初虽然口口声声拥护党，可是，他却反对馬克思主义，反对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政治革命，反对群众运动，其邏輯結論就不能不是反对党的领导。我們知道，党的领导是具体的。抽象拥护，具体反对；口头拥护，实际反对；玩弄玄虛，是掩盖不了反对党的领导

的实质的。况且，在馬寅初的“理論”中，根本就看不见党的领导。“团团轉”的二十个“对立的統一”中，馬寅初根本不提大跃进是总路线的胜利，而总路线是党所制定的；也不提“八字宪法”是党总结农业增产經驗而制定的；更不提只是在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后，才解决了旧社会长期存在的失业問題，也只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才走上富强康乐的道路。馬寅初却把大跃进說成是他的“团团轉”的力量，在“团团轉”中只有物与物之間的机械运动，人在这里是不起作用的，党的领导更显得多余。殊不知如果离开了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創造性，就根本不会有他所列举的“对立”，更不会有他所說的“統一”。随便以其中任何一个为例，比如第一个“对立的統一”，鋼与鉄的关系，炼好鋼要有好鉄，这是极其通俗的常識，然而如果不是由于党的英明领导，怎能生产出一千三百万吨鋼？旧中国从张之洞办汉阳鋼鉄厂起到1948年，四十八年間为什么总共只生产了760吨鋼？道理不是明如日月嗎？

綜上所述，馬寅初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场来創立“新学說”？他的“新学說”到底是什么貨色？宣扬这套“理論”的政治目的是什么？答案是非常清楚的：馬寅初以十分鮮明的资产阶级的立场，贩卖资产阶级的謬論，企图为资产阶级复辟效劳，馬寅初虽然先声夺人地說：“我認为这不是一个政治問題，是一个純粹的学术問題”，然而实际上，早已超出了学术問題的范围。正因为馬寅初死抱着资产阶级立场，所以对一切事物的看法和我們根本不同。他以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世界，而且企图以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世界。所以我們和馬寅初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两条道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

### 三

在今天的形势下，由于馬克思主义已深



入人心，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正欣欣向荣，馬寅初为了宣扬他的一套资产阶级的“理論”，不得不采取从右翼社会党人到铁托修正主义集团所慣用的肮脏手法：披上馬克思主义的外衣，涂上一层馬克思主义的保护色。因此，他大量引用馬克思主义詞句，从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作家的著作、领导同志的指示、党的文件到报纸的社論和文章，装扮成宣传馬克思主义的样子。为了迷惑人，他还口口声声說是为人民着想，“济世救人”，为了“推动大跃进”，为了“早日进共产主义大門”等等。

在用馬克思主义的旗帜打掩护的同时，馬寅初和其他资产阶级分子一样，一方面，“賊喊捉賊”，給批評他的人扣上“教条主义”，“反馬克思主义”的帽子；另一方面，又暗地里用资产阶级理論以“代替”馬克思主义，甚至不惜偷天換日，偷換概念，如把“八字宪法”中的田間管理的“管”，一轉眼变成了无所不管的管；最后，竟貪天之功为己功，宣称大跃进是由于“团团轉”的“伟大力量”，只有他所立的“新学說”才能适应新形势，而馬克思主义則被宣布“已經过时”，“失去效力”。

馬寅初在运用这套手法时，又任意歪曲党的百家爭鳴的方針。我們知道百家爭鳴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学术思想的繁荣，也是为了更好地展开政治思想战綫上的斗争。各种思想和见解，包括毒草在內，都允許“鳴”“放”；当然，对资产阶级思想和观点，我們也开展批判，毒草更不能不鋤。我們在批

判资产阶级思想和观点时，党一向坚持摆事实、說道理，以理服人。而馬寅初却在他的资产阶级謬論受到批判时，装出一副受压制的样子，說別人“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說服”，或者說这些同志“地位高……你对他們无可奈何”等等。这是对百家爭鳴方針的誣蔑。尽管馬寅初在放射毒素，我們从来没有不許他“鳴”“放”，对他的謬論的批判，从来是摆事实、說道理的。試問，馬寅初在受誰压服呢？事实上，是馬寅初摆出一貫“正确”的神气，罵批判他的人是“八股气”，“随风倒”，“徒破而不立”，并声称要“单身独馬”应战到底，决不低头，甚至不惜付出“宝贵的性命”。这些，只能說明馬寅初的态度，与真理愈辯愈明的态度没有什么相同之处。

馬寅初还装出“敢想敢說”的姿态。敢想敢說是共产主义风格，必須有革命的热情，实事求是的精神，才能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才能敢想、敢說、敢做、敢为。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无产阶级立场，违反历史发展规律，标资本主义之“新”，立资产阶级之“异”，是我們所反对的。馬寅初以“敢想敢說”来宣扬其资产阶级的謬論，只是表示其向馬克思主义进攻是公开的狂妄的和囂张的而已。

馬寅初的手法是狡猾的，态度是恶劣而頑强的。我們坚持說服的态度为真理而战，对任何反对馬克思主义的东西，一定要作不留情的斗争，我們要对馬寅初的謬論作彻底的批判。

# 关于“老子”若干问题的研究

鍾大史

## (一)

我們认为决定一种哲学思想是唯物主义的抑或是唯心主义的，主要应当从其学说本身去研究，用馬列主义的方法去划分两个不同的陣营。但产生这种学说的时代背景，和这种学说在当时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这仍然是重要的参考材料之一。因此，在研究“老子”思想之前，弄清楚“老子”其人其书的问题，我們认为是必要的。

关于“老子”其人，汉代司馬迁作史記时，已經弄得不大清楚了。我們不必斤斤計較老子这个人之有无。不过，在孔子前后，的确曾有过象在今本“老子”书中的某种思想。例如，在“論語”中的荷篠丈人，这些隱君子的思想，是和“五千言”中的小国寡民思想相吻合的。可见，在春秋末期，孔子前后，道家思想即已萌芽。但，这是不是說今本“老子”其书也是在这个时候完成的呢？我們认为不是的。

第一，今本“老子”书中，表面看来似乎体系很完整，其实它是有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的。例如：它一方面主张小国寡民的社会，但另一方面又說：“治大国若烹小鮮”，“王侯若能守，万国将自宾”。可见，这“五千言”断非一人一时所完成。

第二，“老子”书中有很多反对仁义，反对尚賢，反对礼治和法治的意见。仁是孔子提出来的，仁义并称，自孟子才始见。墨子倡导尚賢。至于法治的提倡，更在战国末

期。当然，我們并不是說在春秋时代沒有尚賢和主张礼法的事实。但作为一种爭論的命題，則是战国以后的事。“老子”书說：“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又說：“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它对仁、义、礼的說法，是一个一个阶段說下去的。“法令滋章，盜賊多有”，这正是战国以后的情况。可见，这些话是“老子”书的作者在总结春秋以前到战国以后的社会发展实况。如果“老子”书是春秋时代的产物，不会这样写。

第三，“老子”书中的宇宙观和認識論都是比較完整的。孔子則罕言天道，而談人生态方面比較多。据传说，孔子是崇拜老子的。为什么老子有这样完整的天道观，孔子都一字不提，而且在“論語”中，連老子的名字也沒有涉及呢？这是不可理解的。不但如此，孟子对老子也一字不提，这更奇怪。可见，“老子”其书当出在孟子之后。同时“老子”这书的体例很完整，远胜于問答式的“論語”。它不当在“論語”之前出现。

第四，先秦有些书是含有“老子”思想的。例如莊子及“管子”的“内业”、“白心”等篇，以及在“吕氏春秋”很多篇里，它們都沒有标明說是老子的話。在“庄子”中，虽然也有不少地方提到老子，但它是作为寓言来談的，而不是实指老子其人。由此可见，当时老子思想还只是很零散地存在着，

还未有定本的“老子”书出现。我们只须举一个例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淮南子”的“要略训”说：“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是杨朱的主导思想。其余如“吕氏春秋”的“不二篇”，和“管子”，“孟子”等都有批评和说明杨朱贵生的思想。而“老子”书则说：“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可见，“老子”其书是在杨子贵生说出现以后才有的。

据此，我们认为今本“老子”是经过杨朱、宋铤、慎到、庄周等人的思想洗炼而逐步形成的。它在“韩非子”“解老”、“喻老”两篇出现前后才完成一个较有系统的著作。但到汉武帝时代，还不断有所补充。因为今本老子“五千言”共分八十一章，而“八十一”这个数目在西汉是很流行的，同时，“治大国若烹小鲜”，“王侯若能守，万国将自宾”，这正是西汉初年封建统治阶级所需要的思想。这部分思想，因为合于封建帝王的口味，所以在当时就有人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以补充，利用它作为一种封建帝王的统治术。可见汉初黄老之术盛行不是偶然的。

然而，这是不是说，“老子”其书是代表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呢？这却不然。因此，“老子”其书的主要思想还是“贵柔”。它所守的是“雌”，“辱”，“后”，“虚”，“曲”等。它的态度是纯任自然，“无为而治”。它的见解是“有见于谏，无见于信。”它的政治思想是小国寡民。这些思想，基本上还是代表没落氏族贵族的思想。这是由于在战国时候，社会上已经开始由种族奴隶制转向封建制的过渡。这时，氏族贵族更形没落了。他们一方面没有勇气，只得听任自然命运的支配，所以守雌，贵柔，纯任自然，憧憬那小国寡民的恬澹生活。另一方面它又看出“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而“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提出“恬澹无欲”，“无为而治”，

“治大国若烹小鲜”……等反对扰民的政治理论及愚民的政治观点和政策，以期获得社会秩序的安定。这充分反映了没落氏族贵族的厌乱求安的情绪，这是“独善其身”的隐士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及至汉代，这些没落的氏族思想被封建统治阶级看中了，他们觉得这些思想对他们有用，可以用“无为而治”的思想和愚民等政策来消解当时的阶级矛盾。于是他们就在原来的“治大国若烹小鲜”等部分思想基础上加以强调，增加了一些内容，把种种“欲取姑予”的权谋术数提得比较突出和系统化，以弥补原书的不足，于是就形成今本“五千言”的定本。由于它成书的时期比较长，思想比较复杂，所以就有着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我们明白了这点，对“老子”其书的探讨就比较容易了。

## (二)

马列主义告诉我们，进步的阶级总是与唯物主义联系着，而没落的阶级总是与唯心主义联系着的。从春秋战国以至于秦汉，这一历史阶段虽然比较长，但，在这一阶段里，社会性质是由种族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的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时期。这一时期，奴隶主的氏族贵族正在日趋没落，就整个阶级来说，它是走下坡路的。我们认为自荷蓑丈人的隐君子思想到“王侯若能守，万国将自宾”的帝王统治术，这一道家思想发展的过程，正是反映了没落氏族贵族们当时日趋没落，从独善其身，厌乱求安，乃至眷恋小国寡民无知无欲无为的氏族公社，乃至反对扰民的有为政治，并且后来又被封建统治阶级利用，把它作为封建统治的指导思想的过程。可见，这些思想是阶级没落过程中产生的没落思想。如果说，这些思想是唯物主义的，那就很难用马列主义原理给予阐明了。

然而，要研究一种思想是唯物主义的，抑或是唯心主义的，主要还应该从作品本身



去分析。現在我們就進而研究今本“五千言”的思想。

“老子”“五千言”中所說的“道”，究竟是指物質性的，還是指精神性的呢？這是國內學者關於“老子”思想爭論的一個重點。

“老子”的“道”是指“無”。這大抵是人們所公認的。問題是對這“無”的理解，各不相同，從而導致相反的結論。

主張“老子”思想是唯物主義的人們，他們大抵認為“老子”所說的“無”，只是指無形，而不是指無形體。而無形的東西不一定是精神性的東西。物質也有看不見，聽不聞，摸不着的。他們認為“老子”的“無”是“精氣”。“精氣”是看不見，聽不聞，摸不着的物質。因此，他們就斷定“老子”所說的“無”是物質性的，而不是精神性的。他們的論據是“老子”所說：“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的“象”和“物”，以及“窈兮冥兮，其中有精”的“精”，並認為這些都是物質或精氣。究竟這樣解釋對不對呢？我們認為不對。

“老子”曾說：“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于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恍惚。”可見，看不見，聽不聞，摸不着的東西，只是屬於“一”的範疇。而在“一”之上，超出“一”的範疇，比“一”還不皦，還不清楚的才是“道”。

“一”是“道生一”的一。“一”以上是不皦的“道”的範疇，而“一”以下則是“不昧”的，清清楚楚可以看得見，聽得聞，摸得着的萬物。而萬物又復歸于“無物”的“道”。這就是說，由“無物”的“道”，產生看不見，聽不聞，摸不着的“一”，再從“一”產生看得見，聽得聞，摸得着的萬物。那麼，這個“道”如果不是精神性的觀

念，就無法解釋了。所以“老子”又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就是這個意思。

那麼，“老子”說：“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這裡的“物”、“象”、“精”、“信”等都不是指物質。

我們認為，“老子”所說的“道之為物”，和“其中有物”的物，不是指物質，而是指某種“無形”的東西的意思。所說的“象”，即前引“無狀之狀，無物之象”的“象”。它就是恍惚的“道”。“象”，老子又說“大象無形”，也是這個意思。照這樣說來，“老子”所講的“道”，就是指一種恍惚的東西。這種東西是“象”，“象”是“無物”的，也是“無形”的。我們知道，唯物主義認為必須先有物體，然後有形，有形然後有象。但老子卻反過來，認為“象”是不需要物體和形作基礎而獨立存在，而且反過來它又是產生萬物的根源，萬物的發展又復歸于“無物”的“道”，即復歸于“象”。由此可見，“老子”所講的道就是“無物”的“象”，也就是絕對觀念或絕對精神了。

至於“精”，有人說是“精氣”，我們不同意這種解釋。“莊子”的“天下篇”對“老子”總批評道：“以本為精，以物為粗”。它把“物”和“本”對舉。這“本”是什麼呢？我們以為它就是“無”，也就是“道”。因為“物”，照“老子”自己的解釋是“有”，那麼，“本”即“精”，也就自是“無”，自是精神性的東西了。基此，我們同意高亨同志的見解。他說“精”疑當讀為“情”。因為“莊子”“大宗師”說：“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這裡的“情”和“信”，與“老子”那一章合。而且“精”和“情”，古字是通用的。這裡的“情”，按宣云：“動之靜也”，“信”則是“動之符

也。”照这样看来，“老子”所讲“精”和“信”是指“道”，也就是指绝对观念的象的由静而动的运动变化发展过程。我们认为只有这样解，才能把这一章解通。就是说，“道”这个东西是恍惚的，其中有些东西，它是绝对观念的“象”，这“象”是窈冥的，它有自己的由静而动，由动而发展的动力。“象”这绝对观念通过运动变化发展就变成万物，万物运动变化发展则又复归于“无物”，这就是“逝”，“远”，“反”，的过程。所以“庄子”的“天下篇”就总括一句说：“以本为精，以物为粗”。这样解释是左右逢源，随处可通的。

至于“精”，有人说是精气，这是根据“内业”篇说的。但，我们退一步讲，即使是“内业”篇里所说的“精气”，也应该是精神性的，而不是物质性的。因为在“内业”篇里，把精气说成是能知能思的东西，是有神秘性的。有人认为古希腊和十七世纪的某些朴素的唯物主义者，他们的学说中也有神秘的部分，从而断定“老子”的哲学体系，也与他们相似，也是唯物主义。我们认为这样相比附是不恰当的。因为古希腊和十七世纪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者，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在他们解决哲学基本问题时，他们是坚持了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只不过在整个体系中包含有某些唯心主义因素而已。例如，古希腊的朴素唯物主义者赫拉克利特，他是首先承认物质性的火是世界万物产生的根源的，他同时还从物质世界本身去寻找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他在认识论上也承认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都很重要。但是在这样的唯物主义基础之外，他又错误地认为灵魂也是物质的，是火转化的一种状态。至于法国十七世纪进步思想家伽桑狄，也是如此。他也首先认为世界万物是由物质性的原子构成的，他并承认运动是原子的本性，从而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观点，他在认识论上，也坚持了认识起源于感性经验的唯物主义路

线。他在这样的唯物主义体系基础之外，又错误地承认灵魂和上帝的存在。其余很多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者也大率如此。但“老子”则不是如此。“老子”所说的“精”或“精气”，它仍是“老子”世界观中的主要部分。这主要部分既然是有知有思的神秘东西，那么，整个体系就必然要摆到唯心主义阵营中去。如果认为在“老子”哲学中，它的主要部分与古希腊或十七世纪的朴素唯物主义体系中的某些唯心主义杂质相同，从而断定“老子”哲学也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这样说，我们认为是不科学的。

也有人说，“老子”认为“道法自然”，因此就说，“老子”的哲学是唯物主义的。我们不同意这种论点。

我们认为“老子”所说的“自然”不是指“自然界”，而只是说：“自自然然”而已。所谓“自自然然”就是“无为”的意思。例如：他说，“飘风骤雨”是有类于“有为”，所以不能持久，人也是这样。人也要“无为”才能够长生。因此，他推论说：“百姓皆谓我自然”，“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这里所说的“自然”都是“无为”的意思。由此可知，“老子”所谓“道法自然”并没有唯物主义的意味。

### (三)

关于认识论，有人认为“老子”并没有否定感性知识，并认为所谓“玄览”、“直观”，是理性思维。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

很明显，“老子”对于道体的认识是主张“绝圣弃智”，“绝学无忧”，他要求“为道日损”，认为“前识者”是“道之华”的。他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他认为“不窥牖”，“不出户”，就可以见天道，知道天下的事情，和认识“道”的本体。并且“其出邈远，其知弥少”，主张封闭着人们的五官“塞其兑，闭其门”，用



“玄覽”、“直觀”的內省方法來體會“道”的本體。這不是唯心主義的認識論是什麼呢？

所以，我們認為“老子”對事物的認識是主張“以道觀物”，它以為人們只要在內心裡把握了“道”就可以認識一切事物。而人們則只有無知無欲，純任自然才能得道。基於此，“老子”是不需要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的，它也否定了實踐對認識的作用。因此，它的認識論就成為神秘的直觀主義。它這種認識論是與它的唯心主義宇宙觀緊密地聯繫着的。即是說，“老子”承認客觀的絕對精神的“象”的存在，這是客觀唯心主義。但在認識論中，又認為人們只要把握這個“道”，這個絕對精神的“象”，就可以不靠人們的感官，而直接內省，就可以認識到天下萬物了。這樣，“老子”就從客觀唯心主義走向主觀唯心主義。

有人說，“老子”的天道觀是唯物主義，是戰鬥的無神論。我們不同意這種論斷。

主張“老子”是戰鬥的無神論的理由，大抵是認為“老子”曾經說過“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和“天地不仁，以萬物為刍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刍狗”等話。我們認為這些話，並不足以證明“老子”的思想就是戰鬥的無神論。因為，問題還是在於“老子”所說的“道”，究竟是物質性的，還是精神性的。如果“老子”的“道”是精神性的話，那麼，它認為“精神”在上帝之先早就存在着，精神蒞臨天下，那麼鬼神不會作祟。這有什麼戰鬥無神論的意味呢？至於“天地不仁，以萬物為刍狗”等話，我們同意魏源的解釋，認為這不過是“老子”嘆息世道日非之調，（參看“老子”“本義”）也沒有無神論的意味。同時，必須指出：老子也並沒有否定鬼神。例如“老子”曾說：“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等，這些話里的“天”，都是有人格神的意味的。怎能說“老子”是戰鬥的無神論呢？

我們認為，“老子”的天道觀，是與它的“道法自然”的觀點緊密地聯繫着的。“老子”這派人即沒落的氏族貴族們，他們經歷過社會的不斷變革，身受到氏族貴族沒落命運打擊，深刻地認識到鬼神並不真有維護統治階級的力量。因此，他們一方面相信鬼神的存在，並希望鬼神幫助善人，張開恢恢的天網，去惡衛善。但另一方面，又懷疑上帝是世界最高的主宰者。於是，他們就提出更高一層的絕對觀念的“道”作為產生天地萬物的根源。但，他們所提出的“道”是超天地萬物之上的東西，其本質顯然是唯心主義的。由此說來，老子當然不可能是戰鬥的無神論者。

#### （四）

“老子”的哲學體系是客觀唯心主義，並有走上主觀唯心主義的傾向。它的天道觀，也是承認有鬼神的存在。它的政治論，主要是要求把歷史倒退到小國寡民的氏族公社社會，並且主張愚民政策。它也有“治大國”的帝王統治術。它是站在統治者方面為統治者利用的。基於此，“老子”的思想，就整體來說是反動的，這種反動的思想是當時沒落的氏族貴族意識的反映。

然而，“老子”中是不是沒有積極的因素呢？我們認為還是有的：

第一，“老子”說：“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在這裡，它是看到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主要矛盾的。因之，它主張統治者對人民退步，要求統治者恬淡無欲，無為而治，損有餘以補不足，從而緩和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矛盾，鞏固統治者的政權。這點，“老子”雖然站在統治者方面說話，但



也有利于人民，有积极的一面。

第二，“老子”思想中是包含有辩证法的因素的。例如他们看出“九层之台，起于累土”，看出“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这些都是辩证法的思想，有着积极的意义。这是由于“老子”这一派人，他们在所处的时代中，亲身经历了社会巨大的变革，因此，就能看出事物的矛盾斗争和变化发展。可是，必须指出，由于“老子”的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所以它的辩证法是不可能彻底的。它的发展观是循环论，是从“无”发展到“有”，再从“有”而复归于“无”。同时，也由于它的思想是没落的氏族贵族的意识反映，所以它就必然不可能主张用斗争的

方法来解决矛盾的对立。它是反对斗争的。认为解决矛盾的方法是“不争”，认为“不争”就会使得“天下莫能与之争”。这显然是错误的。同时，也正是由于“老子”的发展观是循环论的，所以它应用到政治上就主张恢复小国寡民的氏族公社社会。这实质上是倒退的思想。

第三，由于“老子”认为“不争”是解决矛盾的方法，所以它反对战争，认为“佳兵者，不祥之器。”“战胜以丧礼处之。”这在当时来说，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以上就是我们对“老子”的几个问题的看法。意见极不成熟，希望同志们多多指正。

## 中山大学历史系完成“林则徐全集”编辑工作

由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负责编辑、列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书”的“林则徐全集”一书的编辑工作，已于最近完成。“全集”编辑工作是在该系党总支的直接领导下，又得到系内外和校内外各方面的支持和协助，特别是受了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鼓舞；随着反右倾运动而迅速开展的。

“全集”的内容比较丰富，其中新发现的重要资料，如林则徐的日记，即较过去流传的完整得多。这些日记是从福建林氏后裔那里获得的，记载了林则徐在江苏、湖广、新疆等地十二年间的活动，特别是关于在新疆的日记，使我们找到他被“遣戍伊犁期间在疆南开回疆八城，兴修农田水利等重要资料。此外，新得的书札也非常重要，如他和怡良往来的一百多封信，提供了林则徐在广东禁烟与抗英时期的新材料。又如他和豫坤的一些信件，对了解他如何团结豫坤，豫坤如何与他合作禁烟、抗英的史实，也是极有价值的。在他和潘德舆的通信及其他信件中，可以知道林则徐被在革职后直到他临终前一年，一直在福建老家从事整顿海防、巡视海口、组织抗英活动，致力爱国事业。这次还从林氏后裔那里，抄来很多原稿，如林则徐亲笔的“折产书”，可以看到林则徐遗产有限，生平为官清廉。

“全集”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对奏议、书札等的日期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考证审定，对材料的次序也进行了合理的编排，“全集”计有一百万字左右。分为奏议、公牍、日记、书札、文钞、诗钞、译文七类，并选择了一些有关资料作为附录。编者除了标点、校勘和必要的注释、说明、四译外，还作了两万字左右的序言，并附有林则徐年表及有关图片、照片、地图等等。（胜麟）

# 关于民間文学的加工創作問題

——黎族叙事詩“甘工鳥”后記

杜 桐

## (一)

居住在伟大祖国南方一个四季常青的海島上的黎族，是一个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和悠久的历史文化的兄弟民族。在黎族人民的历史文化的宝库中，丰富的民間传说和多采的黎歌（黎族民歌），是黎族人民也是我国整个民族大家庭中十分可贵的挺秀的花朵。经过作者加工創作的黎族叙事詩“甘工鳥”，还只是这个宝库的百花丛中的一枝；这里有多少民間传说和民歌有待发掘、整理和加工創作啊！为了說明这一点，让我概略地介紹黎族的一些情况。

黎族这个古老的兄弟民族，现在約有四十万人，占海南島总人口百分之十三。其中三十九万人聚居在五指山区黎族苗族自治州原来的七个县，面积一万七千多平方公里，占海南島总面积一半稍多一点，是矿产、森林、渔盐和热带作物极为丰盛之地。我国古籍很早就有关于黎族的記載。宋以前泛称“駱越”、“俚”、“僚”，到宋朝，文献上有了“黎”族的名称。根据几年来对黎族地区社会历史調查的材料，說明在新石器时期，黎族的祖先就已經居住在这个海島上。黎族的社会发展，在二千年前还处在原始氏族社会的末期。当这个原始氏族社会崩溃时，曾經踏入了父权奴隶制；由于汉族铁制工具的輸入、先进生产技术和政治文化的影响，以及黎族人民辛勤的努力，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和提高，使黎族越过奴隶制社会阶段，由原始社会直接向封建社会过渡。因此，在长

时期中它是一个带有父权奴隶制残余的早期的封建社会。直至解放前，在五指山区中心地带（包括“甘工鳥”传说故事发生的七指岭山区在内），当地的封建剥削还带有一种农奴和奴隶性的方式。但是，它的社会阶级分化早已显著和尖銳了。

## (二)

黎族的民間文学是十分丰富多采的。和我国其他兄弟民族的民間文学艺术一样，解放之后，它成为祖国社会主义的民族新文化瑰丽的珍宝之一。因为没有自己的文字記載（解放后已創制黎文草案，尚未正式推行），主要是口头文学，即口头的創作、歌唱和讲述；它的主要形式是民間歌謠与民間故事传说，而民間故事一般又是通过民歌传播的。这样，海南黎族人民就集中地通过歌唱来表达自己对于勤劳勇敢的行为的歌頌，对于雄伟壮丽的大自然的贊美，对于美满幸福生活的愿望，对于坚贞真挚的爱情的追求；特別在解放后，民歌迸发出黎族人民对自己解放翻身和生产文化大跃进的狂欢，以及对党和各族人民領袖毛主席的衷心感戴和歌頌。他們也通过民歌来控訴历代反动統治和欧雅（头人）地主的残酷压榨，以及过去受压迫受剥削的非人生活。他們把民歌作为抒情的工具和斗争的武器。因此，民歌实际上成为黎族人民生活中的一种不可缺少的东西。男女老幼，越唱越有劲头，一斗歌可以連夜继日。下面这首民歌道破黎歌在黎族人

民生活中的地位：

“肚里歌如火药弹，  
一唱地震山腰弯；  
肚里歌如江河水，  
一唱三年流不完。”

黎族的民间故事传说也是极其丰富的。这种民间故事传说的内容，涉及范围很广，包括：本民族来源和历史的传说，风俗习惯的产生和演变，对自然现象的解释；讽刺统治者剥削者的贪婪和愚昧，暴露他们荒淫无耻的生活；叙述人民对剥削者和压迫者的愤恨和斗争，以及民族英雄可歌可泣的事迹；同时，也反映他们对美满幸福生活的向往和美丽的幻想。黎族民歌和其他民间艺术如音乐美术一样，具有极其浓厚的浪漫主义的色彩，大胆豪放，形象鲜明，音调活泼优美，形式变化自由。下面这首著名的民歌的作者，正是黎族人民。

“毛主席来过五指山，  
英雄树下歌过马，  
临去洒下一瓢水，  
红艳艳的开满一树花。”

黎族民歌的格律概略是这样：黎歌每一节的行数，在与汉族杂居或接近汉族的地区，用海南汉语唱的，常常是四句一节（也有八句的）。古典黎歌中一种短小精练的“四情歌”，也是四句的。此外大多数每节没有固定的行数，从两三行到十行以上，没有限制。黎歌句子最常见的是五言或七言两种。也有以五言七言为主体，渗入些三言以至十言以上长短不等的句子。短歌一般是整齐的五、七言，较长的叙事诗则采用长短不等的句子。黎歌很讲究节奏韵律，音乐性很强，音韵和谐，容易琅琅上口；加上语言的凝练，又富口语化，通俗易懂，便于背诵。一般的习惯是：开头第一行的最后一个韵同第二行中任何一个韵都可以协韵；第二行的最后一个韵，又都可以同第三行中的任何一个韵协韵；这样一直到最后一行，连锁地协

韵，十分灵活自如。黎歌的表现方法和语言运用，也很讲究。许多流传久远的黎歌，都善于运用黎族人民所熟悉的事物，具体而形象地表情达意，而且常常大胆地使用一连串生动贴切的比喻，丰富多采，引起人们丰富的想象，把人们引入新鲜和美妙的意境。

当我们谈到黎族民歌在内容上，风格上，格律上，以及表现方法和语言运用上的这些特色的时候，我们就自然地联想起这个民族劳动人民的勤劳勇敢，他们所生活的热带的丛山和海洋的自然环境，他们在征服大自然中和在反抗反动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中的斗争。正因为黎族的民歌和传说，是从黎族人民的劳动和斗争中产生和成长起来，又在劳动和斗争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所以它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但是，由于黎族一直处在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阶段上，特别是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这些民歌和民间传说，长期靠口头创作、口头传唱，不易保留得完整；有时一个故事，有头有尾，甚至在传唱的过程中越来越丰富完整。可是口传久远，因为老一代人亡物故，则又难免遗漏，甚至有失传的危险，或者张冠李戴，搬来搬去，附搭到别个故事上去了。我们从搜集到的黎族古歌的片断以及“甘工鸟”的故事传说中，证明了确实存在着这种情况。

黎族民歌上述两方面的情况，告诉我们：黎族民歌是丰富多采的，我们必须遵循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和党的文艺工作方针，并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下，深入群众，积极发掘、搜集、整理黎族民歌；同时，还必须根据上述后一方面的情况，考虑在广泛搜集和研究黎族民歌特点的基础上，如何进行加工创作的问题。这也就是这次作者在处理“甘工鸟”的叙事诗中碰到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 （三）

我去年在黎族苗族自治州工作时，较多



時間下乡，因此，对黎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有較广泛的接触，在同他們一道劳动和生活中，从他們身上发见許多象是古老又很新鮮可爱的东西，并且为他們的勤勞、純朴、豪放和热情的性格所感动，从而对他們在解放前长期遭受的苦难，有着更强烈的同情。同时看到他們那种对反动統治者的深刻仇恨，不由得对那些企图掩盖黎族社会的階級对立，而把五指山区中心地带曾經存在着的一种以原始家族公社残余形式(即合亩制)而实行封建剝削的現象，說成是没有階級分化的原始公社制度的資產階級学者的謬論，感到憤懣。我在山区的乡下时，又常常听到年青男女对唱着美妙的情歌，他們象唱歌又象對話，象辯論又象猜迷，令人神往；但是，老婆婆們唱的歌，却常常是訴說过去婚姻不自由的痛苦，以及贊叹反抗、逃婚和殉情者的行为。这反映了在反动統治下黎族妇女常常遭到地主、欧雅及其爪牙的掠奪蹂躪，以及由于聘礼过重和其他束縛，青年男女不容易完成婚事等等不合理的遭遇。对这些歌唱，我都感到十分优美，富于感染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我很希望能够整理出一个叙述黎族男女青年为婚姻自由而抗爭的悲壮的叙事民歌，把过去許多勤勞良善的黎族青年这种不幸遭遇和坚貞不屈的事迹表达出来，并通过它来揭示过去黎族社会階級分化和对立的历史真实，同时把美妙的黎族古典民歌介紹出来。后来在保亭县文化館听到有个“甘工鳥”的故事，它叙述一对青年男女为了爭取自由和幸福，坚决向压迫者斗爭，宁可化鳥双双飞入山林，决不屈服。据說这故事在黎族中传唱最广，特别是該县的七指岭一带最为普遍，而且傳說甘工鳥总是一群群飞向七指岭上而来。我高兴极了！但一时找不到唱詞。回到自治州首府通什，知道州的民族歌舞团曾經在七指岭附近搜集到这个故事和唱詞。取来記錄一看，故事和我在七指岭听說的差不多，唱詞也只有二十多句。靠这么

一点資料，当然难于着手整理。一直到去年十月，自治州为建国十周年文艺献礼，决定整理一部黎族史詩。我就在自治州党委的領導和鼓舞下，組成工作組(包括黎文工作干部、州师专的同学和两位黎族同志共八人)，到自治州原来七个县搜集民間故事和民歌材料，同时着重調查記錄关于“甘工鳥”的傳說材料和唱詞，希望获得各种不同的材料，以便互相參証，整理出一部能够反映黎族历史社会背景和黎族人民精神面貌的叙事民歌来。經過两个月的調查，結果除了获得其他一批故事材料和民歌之外，关于“甘工鳥”的故事，得到的只是一些个别情节的补充和在七指岭地区記錄了十多句有关的唱詞。但这一次全面調查，却可靠地說明，甘工鳥故事确是曾經在黎族中广泛流传，深入人心，而且七指岭一带就是傳說的中心，也是故事发生的地点。然而，直到这时，还只有这个故事的片断，人物形象很不完整，唱詞更是寥寥无几。最后，我自己同两位黎族同志，再去七指岭深入查訪。在当地公社党委大力帮助之下，找到一位八十来岁的老婆婆叫程郎員，她幼年曾給地主当长工，被地主冤屈为“禁母”(作魔法害人者)拖去活埋，后来被人救活的。她被公認七指岭一带的老歌手，記得的老民歌也最多。但她所提供的关于“甘工鳥”的情节和唱詞，与我們收集的大致相同。至此，想要获得更多的关于这个故事情节和歌詞是希望不大的了。

在这些材料的面前，特别是“甘工鳥”唱詞这么少，大家感到失望，只好将傳說材料整理成一个短篇的故事，将六、七十行唱詞整理成一个短篇古典黎歌，作为研究之用。而工作組的同志也分別回到工作崗位和学校去了。經過整理的故事情节大致这样：

一个善良、美丽而勤勞的黎族姑娘名叫媧甘，正热恋着自己心爱的情人，但她的后母貪图錢銀和牛羊，把她嫁給一个財主家。丈夫帕三順是个遍身长着

毒疮不象人样的坏家伙。媯甘跑回娘家要父母退婚。但父母坚决不肯，多方威迫，把她禁在大竹籠里准备送回她的夫家。媯甘在籠里听见燕鳥叫声，叹惜人不如鳥，起了插翼变鳥的念头。嫂嫂和妹妹同情媯甘，把她偷偷放出来。媯甘乘人不觉，将銀項环春成翅膀，插翼变鳥，經多次学习后能高飞了，她飞去田头向她父母和情人訴說宁愿变鳥誓不回夫家的决心。又遇着哥哥挑盐回来，哥哥不忍妹妹变鳥，也劝她变回人形，并騙她下来取絲絨綫去筑巢，乘机捉住了她。但是，她还是掙脱飞走了。后来她的情郎也化成鳥，跟着她飞向七指岭山林里去。

这是一个多么动人的故事！媯甘，这个敢于反抗强加于自己身上的命运，敢于掙脱封建伦理的枷鎖，敢于“飞向”自己热恋的情人的黎族少女的形象，虽然现在留下的只是那么三言两語，她的不幸的遭遇，她的勇敢机智，她对爱情的坚貞，仍然是十分生动的。应该承認，一开始我就被这个富有浪漫色彩的又是具有人民性的傳說故事所感动，觉得这个故事的内容虽然简单，但已經具备了动人的基本情节，几十行的唱詞也是一个很好的基础。然而，要把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和寥寥无几的歌詞，整理成一个完整的叙事民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有没有別的道路呢？比如，在这个基础上，用加工創作的方法，或者說得更确切些，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一个叙事詩的創作，是不是可以呢？当时在总路綫、大跃进的鼓舞和激动下，在破除迷信、大胆創造、敢想敢干的启发下，我認为对于这个在黎族人民中长期流传的深入人心的美丽傳說，不应该仅仅满足于这点原来的遗产（当然，它应该而且已經整理、保存），应该进一步丰富它，使之成为較为完整的文学作品。而且，我認为对于群众喜爱的富有人民性的傳說故事題材，如果

流传下来的材料多，就用整理为主的办法来处理，如果流传下来的材料太少了，就用創作为主的办法来处理，这是合理的而且必要的，特别是对于沒有自己文字的民族的口头文学，更应该如此。这不正好是在民歌的整理、研究工作中貫徹两条腿走路的方針嗎？就这样下决心在原有基本情节上加以发展，丰富它的思想内容，突出人物形象，写成一个故事梗概。我把这个故事梗概讲給工作組的同志們听，大家都說比原来的故事完整生动；两位黎族干部認为发展了的故事，符合原来傳說的精神。就这样，根据发展了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的要求，除了已經搜集整理的唱詞之外，大量运用先后积累起来的黎族古典民歌的形象語言材料（主要是情歌，其中个别情歌在邻近黎族住区的汉区也有传唱），并揣摩黎歌的风格特点，試写了全詩的初稿。以后又在各方面、特别是黎族同志的帮助下，进行了多次的修改和提炼，终于写成了这个现在与讀者见面的“甘工鳥”。

在“甘工鳥”的創作实践中，碰到不少的困难。首先是如何在原来傳說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既能提高和加强故事主题思想的人民性，丰富故事的内容和情节，又能保存原来故事的基本輪廓，做到在原来的基础上提高，而不是离开原来的基础“另起炉灶”。原来故事之所以动人，在于它表现了媯甘为了爭取自由幸福的婚姻，坚强反抗压迫，宁为飞鳥，不甘屈辱。这是故事中主要的精华之所在。但原故事却把压迫者集中体现于后母的身上，而放过了罪魁祸首帕三順家。这种本末倒置，严重地削弱了故事的思想性。我把压迫者集中地放在峒主身上；媯甘父母是良善的爹娘；而且同情媯甘和劳海的人們扩大到广泛的村邻、峒民和远在海滨的漁翁，而不仅止于媯甘哥哥、妹妹和嫂嫂；賦予劳动人民在反抗中的惊天地而泣鬼神的力量，并經過諸多艰苦奋斗而火中化鳥，而不是簡簡單單的化鳥；根据我和

黎族劳动人民的接触和理解，創造了劳海的形象，使原来故事中媯甘的“情郎”具体化；劳海与媯甘在劳动中相爱和在斗争中建立了深挚的爱情，不是突如其来地跟着媯甘的化鳥而化鳥，等等。我作上述的这些处理，都是为了使故事的主题思想的积极性更突出，使人物更丰满，使情节更动人。而这样的处理，我以为并不脱离原来故事的主要情节和基本精神。

其次是如何做到既要运用足以表达发展了的远为复杂曲折的情节和人物描写所必需的语言，又要保留黎歌语言运用上的特点和强烈的民族色彩的问题。形成民族文学的特点的诸多方面的条件中，语言是具体表现特点的主要工具。因此，拿黎族民歌的美妙的形象语言，来描写黎族的故事，它就容易反映出黎族的历史社会的实际生活、心理状态、风俗习惯、自然风物以及文学风格等等特点。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中，我主要地借助于黎族的古典民歌，大胆地加以运用。在写“甘工鳥”以前，我就曾经把累积在手头的古典黎歌，后来又从黎文工作队记录的近二万句的民歌中翻译出一大批生动的形象鲜明的语言材料，有整节的，有单句的，也有只是一个形象或一个意境的。这些黎歌的语言，真是丰富多采，生动活泼，是一个诗的语言的宝藏。没有这些语言，“甘工鳥”的创作是很难想象的；即使勉强写成，恐怕就很难说是黎族的东西了。譬如描写媯甘时用的“小媯甘的脸儿呀，象糯米粉白銀銀，小媯甘的牙齿呀，象椰子肉和巴蕉心”，描写劳海时用的“榕树叶子般的脸，黑溜溜一对凤眼”，那些状物词就常见于古典黎歌的语言中，我只是把它融化、洗炼和运用罢了。又如引用“一枝竹蔗半天高，用手折来不用刀”；“銀环圓圓好圈天，要大要小由俺愿”；“口弦噴風波瀾翻，高歌一唱山难挡”，这些大胆夸张的艺术语言，也是黎歌作者的智慧的结晶。“甘工鳥”在语言的运用方面，

自然还存在不少缺点，但我以为在整理或者加工创作民歌、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民歌时，尽量运用其古典民歌的语言，加以提炼，又存其真，这样是可以的。

最后是如何在保持黎歌独具的格律的基础上，吸取汉族民歌和古典诗词的有益因素，使黎歌的格律获得合理的更新。一般来说，诗歌的格律，随着诗歌内容的发展，总是不断更新的。而且往往在不同民族之间，通过交流而相互影响。基于这种认识，我在这个叙事诗中，基本上遵守黎歌的格律，但其中也渗透了一些汉族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因素在里面，甚至渗入了个别的新体诗的因素。这样处理是好还是坏，现在还不能遽下结论，有待于更多的实践；但我以为既然新诗歌的方向应该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古典诗歌以至于新诗歌也必然影响着民歌；既然各民族的诗歌可以而且应该互相学习和交流，那末，汉族民歌对于少数民族的民歌自然不能不产生一定的影响，特别是把黎歌翻译成汉文，这种影响就更是不可避免的了。象“甘工鳥”第十五章中，把原来的黎歌翻译成“魚日砍榕树，兔日削木弓，黃竹来做箭，哥哥手不空”，就很象汉族的古体诗；同一章中根据当地的自然景物，按照黎歌的格调，写成“青青草坡百花鲜，片片飞云蓝蓝天，青青草坡青玉床，蓝蓝云天作罗帐”，这又是汉黎两族民歌格调相互结合的结果。当然，尽量避免新体诗格律的渗入，以保持民歌在形式上的特点，这是对的，例如第二章原来写的是“七指岭高高在半天，早晚云烟遮住了脸，深谷里象棉花铺垫，轻风一吹飘舞回旋。坡下牛儿看不见，牧童只见木铃响。”后来删去了第三、四句，便显出了民歌统一的格调了。

黎族民间文学是极其丰富的，有待于今后全面和深入的发掘、整理和加工创作，特别是对那些富有人民性和具有鲜明特色的黎族民歌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尤其急不容缓。这



个叙事詩在这方面还只能說是一种尝试；采用这种方法来处理少数民族的民間传说，是否正确，还有待于更多实践的检验。不过，象郭老在答复“民間文学”編輯关于大规模收集民歌問題时所說的：“中国的民間文学非常丰富，但我們不能满足于丰富的矿藏了事，要从胚胎状态的东西把好东西提炼出来，加以吸取。……我們学习民間文学，也要提炼、吸取、綜合、創造。这样，我們就有了广阔的天地可走。”正是为了开辟这个“广阔的天地”，我尝试着用加工創作的方法来处理“甘工鳥”这个黎族民間传记。这应该是容許的吧。

“甘工鳥”在内容和形式上还有不少缺点，盼望着获得各方面的指教。

在这个叙事詩的写作过程中，有关上级党委給予了许多指示和关怀；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和作家出版社，热情地給予鼓舞和帮助。在写作初稿过程中，从事搜集材料的工

作組的同志們提供了許多意見；黎族干部王文、刘文耀两同志担任記錄和翻譯黎族口头民歌的工作；王文同志对黎歌材料和黎歌风格特点的运用上，帮助很大。此外，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語言工作队和广东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在海南島工作的同志，以及其他有关的同志們，都給予了許多热情的帮助。作者在这里致以衷心的感谢。

**編者按：**黎族叙事詩“甘工鳥”，发表于1959年十一月号的“作品”，經過作者的修改，广东人民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都将出版单行本。我們认为作者在“后記”中提出的关于民間文学的加工創作問題，不仅是一个文学理論上的問題，而且关系着当前民歌創作的实践上的問題。我們征得作者同意，在本期发表，希望能引起文艺界对这一問題的研究和探討。

## 广州市南区职工开展毛澤东思想学习运动

广州市南区广大的职工群众，經過反右傾斗争之后，进一步体会到不努力提高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就不可能做好工作，搞好生产，因而更加普遍迫切地要求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澤东思想。

在中共南区区委的直接领导下，学习毛澤东思想的运动正在广大的职工群众中热烈展开。一些先进单位如中一烟厂、人民橡胶厂、益丰搪瓷厂、羊城机械厂等，在去年底已經組織工人骨干分子先走一步，采取讀書和鳴放辯論相結合的方法，开始学习“关于高速度問題”。大多数企业单位都制訂理論学习规划；自上而下的层层动員，布置学习。为了扫除思想障碍，端正态度，統一認識，許多单位还組織职工开展“应不应该学理論，如何学好理論”的专题鳴放辯論，推动了学习运动。各行业党委成立工人讲师团，基层单位則普遍建立了輔導組或中心組。中共南区区委还开办了工人理論講座，于本月十三日举行第一次講演会；人民橡胶厂工人讲师組經過学习和集体备课之后，給紅专学校的工人讲了第一次輔導課。（曹平凡）

## 紅 頌

于向阳

剛跨进一九六〇年，我們就强烈地感受到时代更大跃进的脚步声：

工人們創造了開門紅的光輝成就，让鉄花怒放，紅泉噴射！

社員們冒着严寒霜冻，大搞生产，笑迎新春！

一个全党全民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高潮也来到了！

这一切，不禁使人想起毛主席在“长沙”一詞中描繪的那幅壮丽景色：

“看万山紅遍，  
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  
百舸爭流。”

是的，亿万人民正在我們伟大的舵手指引下，在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为創造六十年代更瑰丽的春天，鼓足干劲，乘风破浪，百舸爭流！

紅，象征美丽、幸福、乐观和饱满的革命热情。“东方紅，太阳升”。我們新的国家，从她誕生的那一天起，就如一匹紅色的駿馬，一匹紅色的巨龙，向前飞驰。在宏伟的社会主义建設的各个战綫上，处处紅旗飘飘，紅尘滾滾，其速度可說是人类历史空前的！試問：我們的祖先誰曾料想到：我們两天左右就有一座紅色的大厂矿出现；三天就有一个大厂矿投进生产；十年的水利工程土方就等于五百条万里长城；十年新增的灌溉面积比过去三千年还多一倍！……

这些，好象是神奇的童話，然而它又是活生生的事实！

这一切，是如此生动地、雄辯地証实

了：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多么伟大的科学預言家。“中国的經濟遺產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勞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領導权，加上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援助，其中主要的是苏联的援助，中国經濟建設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計日程功的。”十年前伟大的党和領袖发出的豪言壯語，今天已变成了人民群众的实际行动。

人們在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同时，改造了自己。在經濟、文化战綫上，涌现了多少紅色英雄，紅色专家，紅色社員……

“和火箭比速度，与日月比高低！”我們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什么时候曾經出现过这个意气风发、生机勃勃的大跃进局面？沒有。只有在紅色的时代，才有数不尽的英雄人物！才有这个百花齐发、万木爭荣的大好春天！

一切来自旧社会的知識分子，一切徘徊在“紅专”与“白专”的十字路口的知識分子，面对着这个紅花处处开的壮丽世界，不得不严肃地考虑这样一个問題：今天、應該是从思想上彻底告别那个一去不复返的旧社会、告别那条白专道路的时候了。

我們这个紅色的社会，紅色的世界，为知識分子开辟了走向紅透专深的康庄大道。現在的問題，只在于这些知識分子的自觉了。

实行这个根本的轉变，办法当然很多。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重要的一着。毛泽东思想是在我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时期創造性发展了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我們要从毛泽东著作中，学习他的那种鮮明的无产阶级立场，学习他崇高的大无畏的共产主义风格，学习他对待任何問題所采取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写到这里，使我記起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論”中，对于这个紅色的世界的热情贊歌：共产主义，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进步、

最革命、最合理的无产阶级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惟独它，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

是的，一切腐朽的旧制度，在我们国家里已送进了历史博物馆；终有一天，它在全世界，也不能避免这个命运。难道对于我们

“高尔基政论集”里有一篇“论灰色”。这篇文章写于一九〇五年。时隔半世纪，地隔数万里，今日读起来犹有很大启发。

一九〇五年的俄国，处在一个动荡的年代。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正在那里激烈地展开；“红”与“黑”在作殊死的搏斗。每个人在这动荡的年代里都受着严峻的考验。是革命？抑或反革命？抑或匍伏在暴风雨里惶恐、动摇？高尔基在这篇文章里，指出了在“红”与“黑”之间，龌龊、脆弱地跳跃着一个单调的灰色小东西。他带着异常嫌恶的感情描写道：“它只喜爱温暖的生活、饱满的生活、舒适的生活，而由于这种爱好，它裸露自己的灵魂，宛如饥饿的卖淫妇裸露自己干瘪的肉体。”高尔基在描写了这“灰色小东西”的特点后，又概括地说：“它的灵魂是狡猾的被称为卑鄙的蟾蜍的宝座，它的心是卑怯的谨慎的仓库。它想要多多的享乐，害怕骚扰不安，——这样使它成为两面的和虚伪的东西。”

高尔基所指的灰色小东西，是游离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人们，而当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白热化的时候，这些人又通常都是往“黑”的那边跑去，所以高尔基用了极其尖锐的字眼来揭露他们，抨击他们。我们现在的情况当然与那时的情况不同。我们现在的争论是要不要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要不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但是，虽然两种情况有着极大的不同，我们仍可以从高尔基的

灵魂深处的那个滋生毒菌的“小王国”，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吗？！

举起双手来，迎接理论战线上的开门红——全党全民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高潮！

做一个红色的知识分子，这就是我们的方向。

## “红”“黑”之间

林 遐

“论灰色”里得到有益的启示。试看：在社会主义革命大跃进的年代，不正是有一些人由于喜爱温暖、饱满的

舒适的生活，因而把自己的灵魂变为卑鄙、蟾蜍的宝座、把自己的心儿变为卑怯的谨慎的仓库吗？他们认为“革命已经成功”，无需再做什么努力了，可以坐下来，甚至是躺下来享受一下革命的成果了。他们企求安静。他们希望一切都慢慢来，他们把平庸当做和平，他们把懒散当做正当，他们把自己的革命热情的衰退，当做是精神上必要的休息。他们的心境真正是到了“静如古井”的地步，莫说它不再会奔腾喧嚣地奔向海洋，就连一块砖瓦投掷过来，激起它几圈漪涟，他也要埋怨半天，说是不该扰乱他的平静。这就无怪乎他们和革命的红色的道路背道而驰了。于是，越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骏马奔驰向前，全国人民越是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步伐向前迈进的时候，他们就越是感到与自己有“矛盾”。而且这“矛盾”越来越尖锐了，越来越不允许他们躺在床上做那些“温暖、饱满、舒适”的梦了。于是，他们就开始发起议论来。自然，各式各样的议论都是有的，但是，借用高尔基“论灰色”里那灰色小东西的一段议论，也仍旧是很有概括性的。这个小东西带着教训的口吻对红色说：“不用说，把生活接近理想，已经是时候了。但不可能一下子就满足一切呵！今天一点儿，明天一点儿，人们终究会得到一切啦。计算，这是聪明人的狂热……如果谨慎处理事情，黑就会让步啦……”。象这样的



議論我們不是听得够多了嗎？不过，有的是赤裸裸地講出來，有的是塗了各種顏色講出來，有的是帶了各式各樣的假面具講出來而已。而且他們又總是裝扮得是為公而不是為私。從“論灰色”的分析里，我們更可以体会到，原來這些人都是要達到他個人的企圖，因而用那兩隻灰色的手來阻止我們前進。他們想出各種名堂和理由來阻止我們貫徹執行黨的總路綫，阻止我們大躍進，阻止我們把人民公社办好。

但是，他們的醜態，他們的灰暗，他們的沉郁，他們的虛偽，我們是一眼就看透了的。社會主義革命的駿馬繼續奔馳前進，全國人民的腳步繼續大踏步向前。然而就是這個時候，那些人們，有一部分搖一下身就跑到黑色的懷抱里去了。有些猖狂到極點的，就再也不用什麼化妝和臉譜，赤裸裸地向黨的總路綫，向大躍進，向人民公社發動了進攻。對於這些人，使我們不禁又抄錄高爾基另一段關於“灰色小東西”的斷語：“它可以背叛和出賣，它有各種才能，可是

它從來沒有老老實實的做，從來沒有做出漂亮的事情。”當然，對於這些人，我們也仍是希望他們能轉到紅色的方面來，希望他們改造自己的思想，拋掉自己那一套人生觀，在社會主義建設當中，貢獻自己的力量。

一九六〇年來了。我們要在一九五九年大躍進的基礎上繼續躍進。我們的身上、思想上有沒有一點“灰色小東西”呢？耽於安樂，不事進取，象高爾基所說的那種灰暗、沉郁、肮髒的顏色，在這次整風學習中是不是統統洗刷乾淨了呢？高爾基的“論灰色”深刻地指出由於貪圖享受，害怕艱苦，因而墮落到“黑”色懷抱里去的道理，我們是不是已經認識得很深刻了呢？對於這一點，我們不能不加以警惕。我們應該有決心和這不體面的“灰色”（那怕是一點點）決裂。高爾基說：“灰色拖延着老朽者的死亡，阻難着生者的成長，它是明朗、英勇……的一切的永遠敵人……”。社會主義明朗的春天里，不容得絲毫灰色存在。

## 危險的“病患者”

黃展鵬

黨，給我們指明了一條又紅又專的路。不少知識分子在黨的領導下，經歷了各種各樣的政治思想鬥爭，讀了一些馬克思主義著作，努力改造思想，在紅專的道路上前進了一大步。但是，有些人却認為紅得差不多了。如果這是由於認識模糊的話，那就應該在反右傾鬥爭中清醒過來了。這裡，要花點工夫議論的是這種人：他們以“紅得差不多論”作為盾牌，來掩護自己的資產階級世界觀。他們滿腦子是肮髒的東西，追求個人的名譽、地位、金錢、前途，而又說“紅了”，這是一種什麼樣的症候呢？

二十多年前，魯迅先生曾為自欺欺人的“病患者”畫了一個臉譜，他說，有些人安

于自欺，並想以此欺人；譬如病人，患着浮腫，又諱疾忌醫，企望別人胡塗，誤認他為肥胖，於是妄想既久，自己也覺得肥胖起來，並非浮腫了。——讀完這一段生動的描述，辛辣的諷刺，想起那些標榜“紅了”而實際不紅的人，不正是魯迅先生所說的“把浮腫當作肥胖”的病態么？

毛主席教導我們，無產階級改造世界的革命鬥爭，既要改造客觀世界，也要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這個道理是很明白的，因為社會不斷發展變化，人的思想也要不斷改造，才能適應新的形勢的需要。也就是說，要用不斷革命論的精神來要求自己，而不能有絲毫的自滿，更不能“停步”。特別在今

天，我国阶级斗争的形势说明了：在意识形态上两条道路的斗争，并未真正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现实的阶级斗争面前，放松改造，就无异于给资产阶级思想大开方便之门，一切肮脏的毒菌也就乘虚而入了。不是有些人正是从这儿失足，滑到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了么？

党的口号是：又红又专，红透专深。许许多多同志在这次反右倾的斗争中都深刻体会到，要做到这一点，确实是长期的，需要作很大的努力。说是长期的，当然不是说可以“慢慢来”，而是不要放过任何改造的机会，加紧自我改造。那种飘飘然安于“红了”的人，实质上只是追求只专不红的道路。无数事实说明，专不能离开红，红了更

能专。红透专深，是一个辩证统一，是一个循环往复的无休无止的发展过程，而每一往复，又进到更透更深的一层。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只专不红，是行不通的；我们的国家，不要那种“白专”的人。所谓“有了一技之长，就有了个人的一切”而拒绝改造的人，事实上，往往是走向它的反面：个人的一切都毁灭了。这，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种把浮肿当作肥胖的人一样，老是“自我陶醉”下去，而最终必然会病入膏肓，葬送自己的政治生命。

大势所趋。社会主义是我国人民坚定不移的方向。要跟随时代前进的人，非改造不行了。现在人们大谈特谈改造世界观，我想这正是解决“红透专深”的关键问题，“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应当坚持无产阶级世界观，都不放松对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制止资产阶级世界观在自己头脑中复辟，应当坚定地沿着党所提倡的又红又专的道路前进，坚决地否定任何为了便于溜到只专不红的邪路上去的谬论。”（胡绳：“又红又专的问题是世界观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 波 波 夫 画 画 及 其 他

岑

桑

驰名世界的苏联滑稽演员奥列格·波波夫，表演过一幕讽刺资产阶级文化的滑稽剧：他大摇大摆地出场，把五光十色的颜料掷向面前的画布，然后来了个倒栽葱，两手支地，双脚在画布上乱蹿，于是，一幅图画“杰作”便成功了，可是“画家”自己却因为作画时“劳瘁”过度，昏乱起来，发了疯癫，人们只好把他的画架和画布当作担架，将他抬走了……。

应该说，波波夫表演的滑稽剧并不夸张。在西方世界的艺术之宫里，的确不乏象

这样狂悖反常、用尽一切荒诞的手法脚法以出奇制胜的“艺术家”。两年前，在纽约的音乐界里，据说也出现过一位“倒行逆施”的“音乐家”；他演奏时，用头顶地，双脚倒挂在一个特制的金属架子上，用这种倒栽葱的姿势演奏小提琴，因而声名大噪。可见这种以颠倒取胜的“艺术”活动，已经不是西方世界的美术界所专有的了。最近，这种倒栽葱式的方法，甚至已经被运用于文坛：一位英国“作家”，也是用这种方法找寻灵感的；他在动手写作之前，也懂得来一个坚

葱，另外还加上一种别出心裁的姿势——用舌头舐着一块冰冷的石板。他认为没有比这更为“有效”的找寻“灵感”的办法了。

那个世界真不愧为一个颠倒过来的世界！当然，我们是不必从生理学的角度，去研究那些倒立生活的动物的；因为在他们那儿，人们除了在绘画、演奏、找寻创作“灵感”或者是要杂技的时候，需要用两手支地竖葱以外，平时还得按照万有引力的规律来生活，用双脚走路和用屁股坐沙发。虽然那些颠倒过来吟诗作画的人的丑态，已经很能反映出那个颠颠倒倒的世界的尊容了，但是问题似乎还不在于那儿的人们，竟已发展到以手代脚来生活，而在于他们从来就是颠倒过来看世界的。因此，他们的颠倒，决不光是生活趣味上的颠倒，而且是在一切方面的颠倒。

试回想一下，西方世界那些神魂颠倒的狂人，曾经说出过多少使任何一个脑神经正常的人都感到惊异的、荒谬绝伦的狂言狂语！一九五二年一月，当美国匪徒用凝固汽油弹，去对付朝鲜的每一座学校、医院和茅舍，用襁褓中的婴儿当作射击靶子寻欢作乐的时候，屠杀朝鲜人民的首恶分子之一的范佛里特却曾经这样说：“朝鲜是幸运的。在世界上的这里或那里总要有这么一个朝鲜的。”当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在谴责原子灾害，要求禁止使用核武器的时候，美国原子煽惑家——参议员亚历山大·维利、原子狂人格伦瑟将军以及五角大楼的五星上将军们，却异口同声的叫道：核子战争是一种“最人道的战争”；因为象这样的一种战争，只消“一天，两天，甚至几个小时就可以结束”；他们估计在未来的“按电钮的战争”中，人们是“不知不觉地、因而是毫无痛苦地死去”的，所以他们说，核武器是一种最“仁慈”不过的武器。不久前，美国化学军团首脑斯特布斯，也不甘寂寞地宣扬了化学战争和生物战争是合乎基督教义的，他说：“应该把细菌和瓦斯的情况告诉公众，

以便纠正这样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细菌武器和瓦斯武器是野蛮的。事实上这种武器是人道的……。”他显然认为除了核炸弹之外，“人道”还大可以通过病菌和毒瓦斯的途径来加以维护。听过这些狂人对于“幸福”、“仁慈”和“人道”的阐释，那么，象“真理是丑恶的”、“和平是自由世界的灾难”、“裁军的实现将给人类带来厄运”……等等出自另一批狂人之口的狂语，就丝毫也不足为怪了。

不久前，我国的一位漫画家写过一幅漫画：背景是一个大统计图，图上一支斜向上方的箭头表示我国工农业的大跃进；在统计图前面，一个代表帝国主义的侏儒在竖葱。那个可笑的侏儒看图表时是颠倒过来的，因此他心目中的箭头正好斜向“下”方，于是他情不自禁地喊道：“中国在大跃退！”看来，那幅漫画的确把帝国主义侏儒的嘴脸和姿势画得维妙维肖了。那些善于倒立的人们，那些善于用别人的鲜血来为“幸福”作注解，把核炸弹、病菌和毒瓦斯融化在他们那些骗人的“仁慈”、“人道”等概念中去的狂徒，能够不把我们美好的一切目为“丑陋”，又能够不在我们感到欢欣鼓舞的时候潜然如丧考妣么？！

让我们在那些颠倒过来生活、思考和看世界的敌人面前，在他们的诅咒漫骂声中感到高兴和自豪吧！我们简直可以不假思索地，从相反的方向去理解他们对于是非曲直的评价。当敌人说我们“糟”了，我们就好起来了；说我们“栽筋斗”了，其实我们是顶天立地了。反过来说，当他们微笑称是的时候，那么，我们还能够不对他们微笑称是的东西倍加警惕么！

波波夫的“画画”表演，形象地表达了西方世界的丑剧。那个世界从表到里，从现象到本质，都可以用狂乱这个字眼来加以概括。这真可谓“伤于内而露于形”，那儿的末日也确实不远了！



# 致 讀 者

本刊編輯部

—

我們和全国人民一道，剛送走了“紅到底”的一九五九年，就迎來了“開門紅”的一九六〇年。在新的這一年里，我們將信心百倍地在經濟戰線上繼續躍進的高潮中，為理論戰線上的新高潮的來到，當一名鼓手。

“理論與實踐”是根據廣東理論宣傳與學術研究發展的需要而創辦的一個哲學社會科學綜合性月刊。從一九五八年一月創刊，至今已兩年。兩年來的實踐，證明本刊在“發刊詞”中所規定的力求貫徹黨的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方針，“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科學研究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方針，在服從全國政治鬥爭要求的前提下，在積極參加全國性的理論與學術問題的宣傳與研究同時，努力反映有關廣東的理論和學術問題的研究成果等編輯工作方針是正確的。兩年來，在中共廣東省委的正確領導下，編輯部基本上貫徹執行了上述方針任務，使本刊成為黨在理論戰線上的戰鬥工具，同時在團結廣東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推動廣東學術活動方面，成為黨的助手。所有這些都是與本刊作者的關懷和支持、廣大讀者的愛護和監督分不開的。

當然，由於我們的政治水平還不高，工作上的努力還不夠，因此，兩年來，在編輯工作上還存在不少缺點，刊物的政治質量還不能滿足讀者的要求。在這新的一年，特別是在我國經濟建設的新高潮的同時必然出現的以學習、研究、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中心的理論和學術研究的新高潮中，我們決心在黨的領導和作者的支持以及廣大讀者的監督下，努力提高刊物的政治質量和學術水平。

二

根據當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和理論宣傳、學術研究繼續躍進的新形勢的要求，“理論與實踐”1960年的工作方針和任務是：在黨的領導下，繼續貫徹上述方針，以學習、研究毛澤東思想為中心，積極開展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宣傳，發表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

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典範，是在我國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發展和完善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國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雄辯地證明了這樣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凡是按照毛澤東思想進行革命和建設，就一定會取得勝利；凡是違背了毛澤東思想，革命和建設就一定要遭受挫折。凡是認真學習毛澤東思想並正確掌握其精神實質的人，就一定能站穩立場，做好工作；凡是忽視學習毛澤東思想，或者只學習背誦其詞句的人，就一定會“左”右搖擺，常犯錯誤。因此，積極地系統地開展毛澤東同志著作的學習，是全黨全民的思想建設和理論建設的最重要的任務。特別是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正在高速度地繼續躍進的新形勢之下，這就更是當務之急了。現在，全體幹部、知識分子和工農群眾都自覺地要求更系

系统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以便在实践中更好地运用毛泽东思想；“理论与实践”在这新的一年以至更长的时期内，将努力从各个方面系统地介绍和宣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有计划地发表有关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成果，以期在这个有着重要意义的学习运动中做出贡献。

在开展学习、研究、宣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基础上，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必将促进其他方面学术研究和活动的繁荣。广东省大量的学术问题有待发掘、整理和研究，如关于历代、特别是明清两代广东地区的农民起义，近百年来广东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的研究；关于广东地区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的研究；关于广东地区工人运动史和农民运动史的研究；关于广东地区少数民族问题的研究；关于广东地区历代著名思想家的研究；及关于东南亚问题的研究等等。我们将努力贯彻厚今薄古、古为今用的方针，积极配合这些方面的学术研究的开展，并为发表其研究成果提供适当的篇幅。

### 三

新的一年的“理论与实践”，从内容上到形式上都作了一些改革。内容上，在力求提高刊物的战斗性，更紧密地配合各个时期的政治思想斗争的同时，加强刊物的学术水平；努力充实短论与随笔，既要热情地歌颂革命的新生的事物，又要辛辣地讽刺腐朽垂死的东西；改进学术动态的报导，以充分反映广东地区的学术活动。形式上，既保持严肃朴素的风格，又力求活泼生动，便于阅读。

我们把这新的一年的第一期献于读者之前，热切地期待读者的批评和帮助。我们完全有信心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作者的支持和广大读者的监督下，辛勤地灌溉这一社会主义学术花坛上的嫩芽。

小启：本刊1959年第10期第11期连续刊载的“大众逻辑学讲话”，作者李巨武同志拟修改后出版单行本。本刊从1959年12期开始，不继续发表。

本刊编辑部

更正：本刊1959年第12期的“广东原始社会初探”一文，第29页左边第7行至第11行“马坝发现的人类头骨化石，……可以断定它属于猿人类型的晚期或古人类型的早期。”句，应补正为：“从马坝人类头骨化石的性质及其共生的动物群化石，证明它在人类发展史上属于猿人类型的晚期或古人类型的早期。在我国所发现的人类化石中，马坝人的年代仅晚于中国猿人，而比丁村人、河套人为早。”同页左边第16行至第17行“我们也有理由肯定，”一句应删去。第30页右边第8行至第9行“这时西樵人的经济生活比马格特期较为稳定，”应改为：“这时人类的经济生活比马格特期较为稳定，”；第23行“从而发明了农耕”应改为：“从而发明了农业”。

又同期“试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性质及其成长”一文，第39页左边第23行“基本上都是无产阶级思想的革命文学。”应改为“基本上是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革命文学。”。第42页左边第25行“反映投降，”应更正为“反对投降，”。第42页右边第23行“东战”系“东线”、第23行“三年知道”系“三年早知道”、第32行“黄埔的浪潮”系“黄埔江的浪潮”之误。



# 学术月刊

1960年1月号

目 录

上海社联八个学会举行年会.....	
把百家争鸣的精神发扬下去(本刊创刊三周年笔谈)	
把百家争鸣、自由讨论的精神发扬下去.....	孙叔平
进一步展开经济理论的探讨和百家争鸣.....	朱剑农
谈谈百家争鸣中若干前提认识问题.....	王亚南
怎样进一步推动“百家争鸣”.....	徐怀启
几点小意见.....	杨荣国
对百家争鸣的几点意见.....	漆琪生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	奚原
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若干理论问题.....	吴泽、谢天佑
——论一年来评价曹操讨论中存在的问题	
论学校工作中的群众运动.....	上海师范学院教育学教研室
论根据与条件.....	冯契
干劲与主观能动性.....	邱大猷
读《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学习毛主席著作笔记).....	时进
十年来上海职工生活的巨大变化.....	李铁民
谈谈文艺理论中的几个争论问题.....	贾文昭

編輯者：学术月刊編委会  
地 址：上海高安路63号

訂购处：全国各地邮电局  
定 价：每册零售三角

## 理论与实践

月 刊

1960年第1期(总第25期)

1959年1月25日出版

編輯者：理论与实践編委会  
广州越秀北路222号

印刷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者：理论与实践杂志社  
广州越秀北路222号

发行者：广东省广州市邮局

預訂处：全国各地邮电局、所

本刊代号：46—3 刊号：(穗)0368 印张：4 印数：15,063 定价：每册二角